

衝突

三區窗口

跨區域顧問：Christine Diercks（歐洲），
Daniel Traub-Werner（北美洲），和 Héctor Cothros（拉丁美洲）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的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楊筑甯 (Chu-Ning Yang)、黃泰翰 (Tai-Han Huang)、劉又銘 (Yu-Ming Liu)、陳昌偉 (Chang-Wei chen)、呂思珊 (Szu-Shan Lu)、沈志仁 (Chih-Jen Shen)、洪雅琴 (Ya-Qing Hong)、丁耕原 (Keng-Yuan Ding)、張秀玲 (Hsiu-Ling Chang)、莊麗香 (Li-Hsiang Chuang)、賴憶嫻 (Yi-Hsien Lai)

協調 (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ía Inès Nieto)

「...我們的心智生活從兩兩對立中泉湧而出」
（佛洛伊德，1899年2月19日給 W. Fliess 的信；佛洛伊德全集，1886-1899，278頁）

一、介紹與定義

佛洛伊德所創建的精神分析理論，建立在精神的衝突上—這是人類心智的運作，反映出對立的力量與傾向之間的互動。潛意識衝突被定義為是個體未能察覺的力量在心智中的互動，而精神分析特別強調潛意識衝突的效應。在衝突中，兩相對立的願望、感受、需求、利益、想法、價值，彼此會互相抵觸。在精神分析理論中，精神衝突是人類心智動力的核心，在古典觀點中，精神衝突受本能〔驅力〕能量所驅動，並受情感灌注的幻想所調節。所有的心智歷程都是立基於相衝突的精神力量之互動，接下來又與外在刺激形成複雜的交互作用。

精神分析的主題是精神衝突的潛意識潛伏的那些部分，它最終將立基於潛抑的嬰兒式願望中。這些潛意識的內容會以扭曲的形式重新浮現，例如夢境、失誤行為、症狀、以及文化表現的形式。

對佛洛伊德而言，精神分析中核心的衝突是伊底帕斯衝突。座落在嬰兒式慾望與禁令之間的紛爭，構成了精神生活及其表現的動力。除了其動力的特性，衝突也具備許多後設心理學的成分：地誌學的（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經濟學的（感官過度刺激、現實和享樂原則），起源學的（依自我功能的發展而定），以及結構上的（自

我、超我與原我之間的衝突)。此外，伊底帕斯衝突是處於本能／驅力的二元論之間（性本能／自體保存本能、自我力比多／客體力比多、生／死本能）。

客體關係的理論家所提出的概念化，透過強調（內化的）自體與客體關係的特性，擴展了衝突論的舞台。無論衝突是否被意識所接受，而能被實質地處理、或者是否必須要被潛抑，都取決於涵蓋的本能力量〔驅力〕的強弱，以及個體的心智應對能力與環境條件。

根據當代北美、歐洲與拉丁美洲字典與文章的推展與擴展 (Akhtar's 2009, Auchincloss and Samberg 2012,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Skelton 2006, Borensztein 2014)，（潛意識）衝突能被以下兩兩成雙的論述所定義：

1. 外在的相對於內在的／精神內部的衝突：前者指的是個體與其環境間的衝突，而後者指的是個體自身精神內部的衝突；
2. 外化的相對於內化的衝突：前者涉及已經轉移到外在現實的內在衝突，後者指的是受到與個體驅力與慾望對立的環境限制的合併而引發的精神問題；
3. 發展的衝突相對於時代錯置的衝突：前者指的是發展上常模的、特定階段的、發展轉化的衝突，是由父母挑戰了兒童的願望，或是由兒童本身相互矛盾的願望而引發 (Nagera, 1966)，後者指的是非年齡特定的，並且可能是構成成人階段的精神病理的基礎；有些類似的是，此二元性被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特指為伊底帕斯衝突相對於防衛衝突；
4. 系統之間相對於系統內部的衝突：前者指的是原我與自我，或自我與超我之間的張力 (Freud, 1923, 1926)；後者 (Hartman, 1939; Freud, A. 1965; Laplanche 1973) 指的是不同的本能傾向（愛－攻擊），或不同的自我特性或功能（主動－被動），或不同的超我命令（謙遜－成功）間的衝突；
5. 結構衝突相對於客體關係衝突：前者指的是三大主要精神結構，也就是原我、自我、超我，三者競逐帶來的緊張分歧 (Freud, 1926)，此被經驗為完全屬於個體自身的衝突。後者指的是在結構分化前已經存在的精神空間中的衝突 (Dorpat, 1976; Kernberg, 2003)；另一個對此二元性的說法是伊底帕斯相對於於前伊底帕斯的衝突；
6. 異議型態衝突相對於兩難選擇型態衝突 (Rangell, 1963)；或可類比為，收斂相對於發散的衝突 (Kris, A. 1984, 1985)：前者指可透過妥協（形成）而和解的精神內部力量之間的衝突，後者有時稱作「非此即彼」的衝突，指的是那些不可能接受調解的衝突，只能被迫選擇其中一方，接著哀悼或放棄其他選擇。

全世界許多不同的精神分析學派之間，存在著各種異同，重視衝突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光譜的一端是當代佛洛伊德學派與克萊恩學派的傾向，繼續秉持著衝突是形成精神發展與功能的核心概念的想法。光譜的另一端則可能是 Kohut 的自體心理學觀點，此發展理論基於精神結構的匱乏與獲得，而呈現了很不一樣的典範，除了簡短提到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衝突之外，焦點放在不同的自體客體需求，與衝突有關的觀點則退居背景。

如何看待衝突，是關乎以下兩者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佛洛伊德的理論發展，相對於，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

二、理論發展階段：佛洛伊德

追蹤佛洛伊德對衝突概念的變化，可以劃分出他的理論發展的不同時期。三種不同的精神病理試圖用來管理衝突的獨特方法，會發展出不同的病徵。歇斯底里症是將性與社會之間的爭鬥，以身體症狀的方式顯現出來，製造出心智與身體間的衝突。強迫症的個體將想法與情感之間的衝突，置換為看似無害的強迫想法。妄想症的病人將他們無法相容的經驗投射至外在世界，創造出內在與外在世界間的衝突。這些無法充分解決精神衝突的獨特方式，漸漸在不同的理論發展階段形成體系。

二、A. 創傷與前分析的宣洩時期 (1893–1899)

在這時期，佛洛伊德討論創傷事件相關的情感與社會道德的禁律，這兩者間的衝突指出了內在一外在的、人際間的衝突，其中就隱含著內在對立的力量概念 (Freud, 1893-1895)。西元 1899 年，比較夢與歇斯底里症狀，佛洛伊德追溯其 1894 年關於衝突的論述：「並非只有夢是願望的滿足，歇斯底里發作也是一樣...我很久以前就曾經說過...現實—願望滿足。我們的心智生活就是起源於此兩兩對立的配對。」 (Freud, 1899, p. 278)。在他早年歇斯底里的工作中，佛洛伊德發現這些病人的性慾望與社會規範衝突，而病態地消除衝突就造成了症狀。症狀正是解決衝突的不充分方法：「...病人...享有良好的心智健康，直至他們概念的生活發生了不相容事件...直至他們的自我被迫面對一種引起了痛苦情感的經驗、想法、或感受，以至於主體決定要去忘掉它，因為他沒有信心自己有能力用思考—活動，來解決不相容的想法與自我之間的矛盾...」 (1894a, p. 47, 斜體為原文強調)。

受 Josef Breuer 治療 Anna O. 的經驗，以及 Charcot 對創傷後歇斯底里癱瘓的示範，和採用催眠的暗示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癱瘓以及其反轉的實驗所啟發，佛洛伊德與 Breuer 假設 (Freud and Breuer 1895)，在轉化型歇斯底里症患者內在，出現了特定的心智狀況，其中無法被宣洩之暴力、創傷性情感，被轉化為身體症狀。這些症狀以身體的現象表達，但起源不是來自於身體，他們只是被用來（象徵地）表達引發歇斯底里發作的事件。憶起初始事件的路徑已經被切斷，且和清醒的意識解離。佛洛伊德寫道：「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疾病機轉，並非微小的身體傷害，而是恐懼的情感—精神的創傷。相同的，我們的調查顯示，許多（若非幾乎）歇斯底里症狀的促成原因只能被描述為精神創傷。任何引起痛苦情感的經驗（例如驚嚇、焦慮、羞恥或身體疼痛）都可能造成此類創傷」 (Freud and Breuer 1895, pp. 5-6)。

與其他價值衝突的想法和願望的衝動若被壓抑，將會導致症狀。在 1894 年，佛洛伊德構想了一套關於歇斯底里症的轉化症狀、強迫症、和畏懼症的初步衝突理論，並將其總結成防衛性的官能症-精神病 (Freud 1894a, b) 的術語。與衝突理論相反的，在防衛性的官能症-精神病中，佛洛伊德了解到真實的官能症 (actual neuroses) 的症狀，包括焦慮官能症 (anxiety neurosis) 和神經衰弱 (neurasthenia) (Freud 1894c; Freud 1898)，並不是正常心智功能運作的表現，而是直接由性能量宣洩不足所引起的一種毒性力比多轉變的結果。再者，他很清楚他的女病人的這些不相容的想法「主要來自性經驗與

感官感覺的土壤上」(Freud 1894a, p. 47)。此外他還發現，這些想法與早期童年的經驗相關，因而做出了他的病人必定曾受苦於被成人性誘惑的結論(Freud 1896, p. 203)。因此，歇斯底里症狀是直接來自於潛意識地運作這些經驗的記憶，一旦被當前事件觸發時，這種記憶將(回溯地)復甦並且變得非常有影響力。他進一步指出，只要這些童年事件仍留存於潛意識中，其病原性的本質就會存在。(同上, 211)

然而(在他那封眾所皆知於 1897 年 9 月 21 日寫給 Wilhelm Fliess 的信中)他寫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經說〔精神官能症的理論〕」(Freud, 1897, p. 259)。「因為知道在潛意識裡沒有現實的標示，所以我們將無法辨別有被情感灌注的真實與虛構」的這個想法，讓佛洛伊德質疑自己的誘惑論(同上, p. 260)。從分析他自己的夢境，佛洛伊德於 1897 年 10 月 15 日構想出一個關鍵性的洞察：「我有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想法，我已經發現，我自己也是這樣，愛著我的媽媽並且忌妒著我的爸爸〔的現象〕，現在我認為這是童年早期的共同事件，即便不如那些已經變成歇斯底里的兒童來的早。〔...〕每一個觀眾都曾經在幻想中是個剛萌芽的伊底帕斯，並且因為恐懼夢境會移植到現實中實現而退縮，於是用全部配額的潛抑，來分隔他嬰孩式狀態和他當下的狀態。」(同上, p. 265)。

然而不久之後，他再次提出令人震撼的性暴力個案，並且在一封給 Fliess 的信中他宣布了(引述自 Goethe 的 Mignon)「新箴言：你遭遇什麼了，可憐的孩子？」(Freud 1897, p. 289; Goethe 1795/96)。他來回擺盪，但從來不曾完全放棄創傷是病因學的說法，儘管所有對於被憶起的創傷誘惑造成的心理後果之質疑，他仍然堅持一個打從 1897 年開始的概念，也就是患者的「精神官能症的症狀並非直接關聯到真實的事件，而是滿懷願望的幻想，因此，對精神官能症來說，精神現實相比於物質現實，有更多的重要性」(Freud 1925, p. 34)。對他來說，此時創傷之概念已與另一組概念對立，即根源於「內在」世界，受驅力驅動的嬰兒式願望幻想，在無條件的滿足慾望和禁律之間衝突著。在此，啟蒙的理性主體，遇上了一個被潛意識願望驅策的自我，並且對他/她生命初始極端依賴的環境作出反應。這關鍵的動力之介面是伊底帕斯衝突，源起於對我們的原初客體之愛與恨的衝動所導致。在 1925 年時他回憶到，「事實上那時我第一次偶然發現了伊底帕斯情結，後來被斷定是如此壓倒性的重要，然而在那幻想的偽裝之下，我當時並沒有辨識出來。」(Freud 1925, p. 34, 原文所強調)。衝突的伊底帕斯危機之結果，構成了精神生活的動力以及表現。

在創傷與衝突面對面的這個主題上，佛洛伊德有不一致的立場。例如，以前在他的講座中他指出「在強烈且致病的重要嬰兒式經驗以及其後經驗之間，有一種互補關係存在，近似於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有些個案中，整個成因都在童年的性經驗，這些性經驗在這些個案上施加了毫無疑問的創傷性效果，他們的性體質以及未發展完全的事實正是提供了證明。與此同時，在其他個案裡，也有些人所有的著重點都放在之後的衝突，我們發現在分析之中，那些童年的印象所強調的全部都是退行的工作。因此我們有「發展抑制」與「退行」兩種極端，以及兩者之間兩種因素各種程度的協作。」(Freud, 1916-1917, p. 364)。在他 1925 年的回顧裡，只提到他發現嬰兒式幻想中願望的部分：「我最後必須承認這些誘惑的場景從未發生過，它們只是我的患者們捏造出來的，又或者可能是我自己加諸於他們的幻想」(Freud 1925, p. 33)。整體來看，當佛洛伊德構想中的精神分析理論以及發病機制理論，都逐漸變得更複雜後，關於衝突與創傷的關係，以及其多重的原因與後果的觀念，會得到附加「過度決定的」

以及「互補的」特點：來自外界強大的創傷性激發，突破防護盾或外在刺激屏障 (Freud, 1920)，這樣的概念逐漸退場，轉而支持把創傷定義為，面臨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內在的或外在的危險時，自我的無助狀態 (Freud, 1926)，這可以發生在人生中的任何時期，自我的未成熟會使個體易於陷入無助的狀態。

精神官能症的產生，和真實甚至創傷性的經驗、或願望式的幻想，是結合在一起的嗎？答案是，都是「真的」，誘惑場景的真實性或者是其虛構的本質，遍佈整個精神分析理論 (Rand & Torok, 1996, p. 305)，兩者纏繞關聯的複雜性，在佛洛伊德的臨床個案裡是最好的說明 (Freud 1905b; 1909a, b; 1910a; 1911b; 1918)。Ilse Grubrich-Simitis (1987, 2000) 指出，若是佛洛伊德堅持他原版的誘惑理論會更加容易。家庭環境裡的性虐待為人所知，卻代表了一種離經叛道。這種創傷模型將可以強調常態與病態間的差異。相對的，驅力模型說的是，人古老的嬰兒式的征服和死亡願望，以及不可避免的本能的〔驅力〕本質，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雖然佛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處處強調，創傷是關鍵的致病原因，然而對內在因素的強調可能促成一個事實，精神分析概念的理論論述「將與創傷原因有關的驅力相關的衝突以及原慾的固著，移動到了邊緣。」 (Bohleber 2000, p. 802)。當代精神分析的創傷理論，考慮的是創傷的類型與強度、此人在創傷發生作用前的心理狀態、以及親密照顧者和環境對創傷受害者的反應。

二、B. 地誌學理論以及焦慮的首要理論 (1900–1920)

當佛洛伊德繼續進行他的自我分析，他更加認為衝突是內在的。在概念化內在衝突裡，他以本能取代情感，並且假定禁律的力量也是存在於內部 (Freud, 1900; Freud, 1905a,b)。在〈夢的解析〉(1900) 中，這些衝突被理論化為發生在意識與潛意識的結構之間。夢的解析 (1900) 算是首見清楚地把精神衝突內在結構化，這將會正式開啟了精神分析的發展。伊底帕斯情結的理論 (Freud, 1900) 說明了衝突的所有因素 (Freud, 1905b)，都在一個人與母親、父親、雙親配偶、以及與手足的初始客體關係之發展脈絡中。在此愛及慾望，與敵意及謀殺發生衝突，兩者又與家庭的及社會的現實發生衝突。內在衝突，被闡述並理解為，發生在性本能與自我保存本能之間 (Freud, 1910a; Freud, 1911a; Freud, 1914; Freud, 1915a, b, c)。

這個時期見證了佛洛伊德思考關於衝突的一個關鍵拓展。在他的〈整合陳述心智運作的兩個原則〉(Freud, 1911) 中，他描述了享樂原則相對於現實原則的發展變遷。兩者間的基本核心差異在主體與痛苦的關係。享樂原則可以說是憎惡痛苦原則，它追求享樂以擱置並掩蓋痛苦。為了遮蔽痛苦，心智會幻想或幻覺沒有痛苦存在的滿足。當心智了解到幻覺不會創造真實的滿足，它會學習適應現實，即使這包含經驗痛苦：

「只有在期待的滿足感從未出現，體驗到失望，才能放棄這種藉由幻覺得到滿足的企圖。取而代之地，精神裝置也必須決定，形成一個外在世界真實情況的概念，並且奮力在這裡發生真實的改變。一個新的心智運作原則因而被引進；展現在心智裡的，不再是欣然接受的，而是真實的，即使那是令人厭惡的。現實原則的建立是重大的一步。」 (Freud, 1911a, p. 219, 斜體是原文強調)

佛洛伊德關於「心智決定形成一個現實的概念」的聲明，將會成為 Bion 的理論起始點。這篇論文可以看見術語上的微妙轉變，當佛洛伊德一開始提到享樂與現實間的

衝突，一開始說的是原則，後來變成自我不同的面向。聚焦於自我，以及其介於兩個不同世界觀之間的分裂，界定了佛洛伊德開創「自我的心理學」，預示了 1923 年的結構理論。自我不得接受的，它便潛抑，但這便損害了意識接觸現實的能力。

在鼠人的個案史中，佛洛伊德 (1909a) 總結他的精神病理：「他的一生中...他確定無疑地受到愛與恨之間的衝突所害，同時也是關於他的愛人與他的父親。」 (1909a, p. 237)。四年後在《圖騰與禁忌》(1912-13) 裡，當佛洛伊德從禁忌禁律方面來討論時，他將會稱此為情感矛盾的衝突：

「心理萬象的主要特徵，以這種方式固定下來，或許可以描述為主體對於單一客體矛盾的態度，或者說是對於某種關於客體的行動。他一直願望施行這個行動（觸摸）〔並且旁觀著它成為他至高無上的樂趣，但他不可以施行它〕，也同時厭惡它。這兩股勢力之間的衝突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其他擺法）它們被這種方式，限制在主體心靈的特定位置，使得它們無法再起身來彼此對抗。」 (Freud, 1913, p. 29)

佛洛伊德在此表達的想法是，除了想法和情感之間的衝突之外，也有一種情緒本身之內的衝突。

這裡所闡述的情緒矛盾的想法，可以看做是發生在原始的客體關係脈絡中，這也說明了這個時期佛洛伊德的想法。這個時期，他的想法顯露出他的自戀概念的開端 (Freud, 1914)，也是許多客體關係理論的起始點之一。在投資於自體或者投資於客體之間的掙扎，衝突的形貌於此成形，或者如他說的，是在自戀以及客體選擇之間的衝突。在《哀悼與憂鬱》，佛洛伊德論述失落、認同、以及進一步闡述自我之內的衝突時，這變得格外重要。(Freud, 1917)

佛洛伊德寫到，心智無法承受某些有價值且需要的事物的失落，於是當外在世界有失落發生之時，客體便會被納入幻想之中，使得客體能在內在世界中存在著；一種否認外在世界中客體缺席的方式。他寫到：「當憂鬱取代了對客體的掙扎，在自我內部的衝突必定就像個疼痛的傷口...」 (Freud, 1917, p.258)。從另一個觀點來說，這也可被視為對整合客體缺席的掙扎過程，這是之後 Lacan 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面向。

佛洛伊德下一個時期在地誌學理論內的思考，開始於〈享樂原則之外〉(1920)。於此，攻擊驅力被加入性驅力，而衝突則可概念化為，本能驅力相對於防衛機制／潛抑 (Freud, 1920)。各式變換樣貌的防衛，與人格發展的不同時期有關。焦慮則繼續被視為來自於潛抑的結果（焦慮的第一理論）。潛抑大多是用來做為防衛的代名詞。

在〈享樂原則之外〉(1920) 中，佛洛伊德闡述了他當時認為的心智的原初衝突，那在生命與死亡之間，以試圖更新生命的本能與尋求重覆創傷的本能之形式，衝突發生在要創造更高程度的個體，或是要回歸無機質的物質之間。佛洛伊德的本能理論經歷了這些年來討論發展的各種轉變之後，他清楚地聲明他對衝突的基本看法：「我們的觀點從一開始即是二元論點...」 (p.53)

佛洛伊德在此也定義，發展是衝突的結果。在「趨向完美之本能」中他告訴我們，「那些與之有關的現象，似乎可以用愛欲 (Eros) 努力與潛抑之結果相連接後，所

產生的影響來解釋」(Freud, 1920, p.43)。在愛欲與愛欲被潛抑之間的衝突，創造了對進步的渴求，而增加了昇華的能力。這是佛洛伊德早在他對達文西的論文中 (Freud, 1910) 就表明的，而揭開了應用精神分析的開始。

在他生命的晚期，佛洛伊德又回到這個論點並且發揚了它的重要性。他最終將生死本能之間的衝突，視為對人類全部行為與思考之概念化的基石：「唯有藉由兩種原初本能（愛欲本能與死亡本能）的合流或是對立，缺一不可，我們才能解釋生命現象的豐富多樣性。」(Freud, 1937, p. 243)。

二、C. 結構理論（第二地誌學理論）(1923-1937)

下一階段的理論發展，被稱為結構理論（或在北美洲以外的地區被稱為第二地誌學理論），發表於 1923 年，揭開人格結構的三個部份：原我、自我、超我 (Freud, 1923)。佛洛伊德理論的這一時期，經由在這場三方棋局之中，定位了自我的位置，而揭開了對衝突的概念。在〈自我與原我〉(1923) 之中，佛洛伊德將他所有對衝突的看法整合入一個高度複雜的單一系統中。在此，自我必須在數個衝突的關係中奮戰。首先，自我必須與它自己和原我的衝動之間的衝突奮戰，這些原我的衝動本身是存在於生與死之本能之間的衝突。其次，自我必須為這些衝動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來指引道路。第三，自我，在它對客體的認同之中，在自己內部創造了另一個層級，這被佛洛伊德名之為超我，用來收納目前已經內化的客體。因此，自我創造了另一個它自己與它的超我之間的衝突。超我涉入衝突的複雜程度是預料中的，當它是自我內在的一個特殊層級—自我理想的時候，就已被預見 (Freud, 1921)，而且也由於它在個體發展中被建構為伊底帕斯衝突的繼承者 (1924b)。

焦慮的訊號理論（焦慮的第二理論），在結構衝突已全面性地浮現時，驟然而生 (Freud, 1926)。防衛機制被定義且位在於自我（的潛意識部份）。除了之前被定義過的潛抑、反向作用、退化、認同與投射，「拒認」(disavowal) 的概念也佔據了越發顯著的位置 (Freud 1923b, 1924b)。潛抑被視為防衛的一種。焦慮變為防衛的動因（觸發器），而不是防衛的結果。精神官能症症狀，被視為起自於本能與防衛之間的衝突的妥協形成，由內在的道德禁律（超我）與外在壓力的參與而成。在這年代的結構衝突，有時也被稱為系統間衝突，而與稍晚 Hartmann 的自我內部的系統內衝突相區隔。

以發展的角度來看，「引起潛抑的動因，在現今而言被概念化為恐懼的繼承，這一點在兒童身上相當具有說服力，牽涉到父母的責難與處罰。這些責難與處罰在發展過程裡，它本身主要活躍在潛意識的模式裡，被內化並被歸納在稱為超我的道德代理者的影響。」(Abend, 2007, p. 1420)。在結構理論裡，超我成為了伊底帕斯情結的一個繼承者。

在這階段的理論發展中，自我成為了臨床動作的焦點。堅定地固守在精神內衝突的焦點，佛洛伊德在 1937 年寫到：「...分析的工作是穩固對自我的功能而言，所能達到最佳的心理狀態；於此自我能夠履行它的任務」(Freud, 1937a, p. 250)。目標是調適被分析者的自我，好使得它可以更好地去處理本能的要求，往表現與滿足去前進。透過詮釋的再建構與建構而達成洞見的方法已被進一步精修 (Freud, 1937b)。自我的多重角色如，防衛的發起者、決策制定者、行動的執行者、心智生活中的衝突元素的聚合者、環境狀態的評估者與談判者，使得自我被放在分析感興趣的中心，「份量如此

多，以致於佛洛伊德追隨者的精神分析理論的下一階段，被稱為自我心理學」(Abend, 2007, p.1420)。

三、歐洲與北美的後佛洛伊德發展

對衝突的概念化，界定了在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理論。在英國而後來延展到美國，兩條由佛洛伊德的工作分歧出的路線，發生了衝突：自我心理學與客體關係。這是精神分析中一場豐富的理論衝突，在世界各地激發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未來發展。

三、A. 衝突在發展中的角色：發展缺陷與精神病

「衝突相對於創傷」的爭論，藉由一種結構缺陷的模式而擴大了。在此，病因學的假說不是由驅力激發的衝突，而是在於已被弱化的自我（由創傷環境的影響或是先天體質所引起）。相關的詞彙如「基本錯誤」(Balint, 1968)，「早期人格疾患」與「結構的自我混亂」(Fürstenau, 1977)。缺陷假說的支持者，立基於童年早期具有因果關係的嚴重創傷事件的假設（其中有些不是非常明顯，甚至更常是因為照顧者在回應、涵容、與承受之缺陷而引起的）主張在精神病發病之後，創傷便接續了缺陷的功能。這意味，受制於創傷事件的病人，他們是情境的受害者，他們本身沒有足夠能力可以影響這些過程。治療於是主要是朝向替代方案與精神教育的影響。

相對於發展衝突的概念，其他想法則認為精神病過程乃由精神內衝突所引起。基本的內在兩難困境，遠超乎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發生在兩股互斥的勢力之中，導致了分裂過程、去象徵化以及僵化的行為。在許多這樣的案例中，童年早期的創傷會被提到 (Kapfhammer 2012a, 2012b)。衝突模式並不將創傷本身視做精神病的病因，而是將精神病性的功能視為過程的結果。在這過程中，精神裝置使用過多分裂機制，為在創傷之後威脅到生存的內在不相容性試圖找到解方。因此，能主動地形塑症狀發展的可能性，是病人透過精神分析治療過程，與透過沉浸在這過程中，發生一種共享的語言與現實，協助了對之前無法思考的事物的再象徵化與整合。

精神分析是起於心智衝突的一種理論，是人類狀態中恆常的與共通的一個面向，以及精神發展的一種燃料。被認為是一個主要目標在於發掘與消除潛意識衝突的學門，隨著時間過去，這個核心概念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在精神分析方面來說變得毫無疑問，到了一種不需要任何新的定義的程度。隨著對精神世界探索的增深，與隨之而來對潛意識心智生活了解的新方法的發展，在精神動力中衝突的角色已被縮減：雖然衝突仍被視為精神分析的主要關注，焦點已轉移到斟酌各種理論、臨床模式的其他議題。起自於 Hartmann 的無衝突的自我裝置的意見之導論 (Hartmann, 1939)，對衝突的角色的觀點有重要改變之後，大約二十世紀中葉，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的焦點，便擴展到衝突理論之外。對衝突在精神病理學了解與施行分析治療中的次要角色，影響最劇的是，變得更加聚焦於發展的前衝突階段與帶來改變的關係因子。

然而，如此的重點轉移並未以同樣的方式去影響到所有的精神分析學派。如果我們以某程度上較為概要與簡略的方式推論，許多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的模式圍繞著四個主要議題而發展（驅力、自我、自體、與客體關係），我們可以描繪出在每一個議題中衝突所扮演的角色。從驅力的角度來說，個體以驅策變遷的角度來審視，形塑了被包埋於行動、意識與潛意識幻想中的欲求，這些欲求經常被經驗為不可接受與危險

的。因此，精神生活經常被視為是圍繞著衝突與衝突的解決方案所組織的，並且以焦慮、罪惡、羞恥、抑制、症狀形成，以及病理的性格特質為主要表現。焦點落於欲求與驅策，以及對抗它們的防衛。

以自我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適應的能力、對現實感的能力與防衛的能力。發展上，適應、現實感和防衛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發展，是驅力-衝突的動力之結果。以自體經驗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持續的主觀經驗，特別是自我界線、自體與他人的區別、分離感、自尊、整體／片段、連續／不連續的程度。在此，衝突在組織精神結構上並不重要。以客體關係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孩童期經驗的內在意象，客體則被視作是在任何新經驗中發揮作用的。在這些取向中，衝突關切的是，主體的精神內在間、精神結構間，以及人際間的世界。

對於衝突相對於缺陷的效度爭議，在二十世紀末期的數十年間仍然延燒著。這些爭議的源頭，可以回溯到 Hartmann 對於自我的自主性與無衝突區域的概念的一種特別的詮釋。面對衝突理論的爭議，Blum (1985) 和 Murray (1995) 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自我使用防衛機制，作為有力量的、具有保護的、與適應的工具，來回應外在、內在、真實或想像的危險。過度的使用防衛，會傷害到非防衛性的人格功能，於是防衛會阻礙了人格的發展，導致自我的限縮與病態化。然而，無論是否有創傷相關的經驗，發展依然會進行。對於佛洛伊德認為，自我可以在創傷的外在條件下進行適應之陳述，在當代可被重述為特定的自我裡的內在系統衝突。衝突發生在防衛與非防衛功能之間 (Papiasvili, 1995)，透過精神分析的方法來，掃描、發現和分析，從前性器期到伊底帕斯期，及伊底帕斯後期的相關精神內在的衝突。在多年臨床與理論知識的逐漸積累下，在所有個案中的所有發展階段，都被觀察到是臨在和運作的。自我內部自體表徵的病態，也各式各樣地參與其中。Axel Hoffer (1985) 在自體保護的衝突之概念中，描述了環繞缺陷為中心的一種特殊的衝突活動。這個概念描繪了為了隱藏「有缺陷的自我」的努力，以及經常伴隨著強烈需求而發展的特定精神內在衝突。「羞恥和自我蔑視的感覺不僅與感知到的『缺陷』本身有關，而且與絕望的、經常是報復性的努力來獲得補償有關...」(Hoffer, 1985, p. 773)。

許多不同取向的當代理論家，以多重視角來看待發展和精神病理學，包括衝突和缺陷。一些理論傾向著重於缺陷，例如自體心理學關注因父母不足的同理所導致的自體缺陷，因此除了詮釋衝突之外，也把分析師的共感理解，視作治療行動的核心 (Kohut, 1984)。另外像是關係及人際學派，把關注的焦點從內在的缺陷與衝突 (Auchincloss and Samberg, 2012)，轉移至強調在更廣大文化中和他人的關係如何形塑個人的內在世界 (Ingram, 1985)。

最近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出版物《精神分析的術語和概念》(Auchincloss & Samberg, 2012) 的編輯群，反思當代精神分析觀點越來越重視與衝突有關的發展議題。

在發展中，衝突是來自於應對一系列可預測的、發展階段特定的潛意識威脅，即所謂的內部危險情況。在正常的早期發展中，前伊底帕斯的衝突發生在兒童和他／她的環境之間，相斥的願望和情感之間，以及超我前驅物和驅力之間。在前伊底帕斯的衝突，對孩子的威脅是，失去所愛的客體，以及失去所愛客體對自己的愛之幻想的危險。伊底帕斯的衝突，則更為複雜，展現孩子面對三人客體關係的能力，以及自我的成熟與發展的其他面向。在伊底帕斯期，對孩子的威脅包含了被傷害之幻想的危險

(閹割情結)。隨後，通過內化與認同的歷程，最初與父母控制有關的禁律力量，已成為孩子自己心中的力量。這樣的歷程在超我形成的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個發展的里程碑，通過解決伊底帕斯情結來達成。在這個階段，對孩子的威脅是，超我的內部譴責。雖然一些衝突會隨著發展而得到解決，但有一些衝突則終生持續存在，形成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理。

衝突的展現會隨著發展程度、精神病理以及文化因素而異。兒童精神分析師也描述了正常的、可預期的發展衝突，這些衝突通常是短暫的 (Tyson & Tyson, 1990)。這些是存在孩童內部規範階段特定的成熟力量的衝突，使得兒童與他／她的環境發生衝突。當把外部的要求內化完成時，這種特定的發展衝突將會消失，同時進一步邁向結構化與性格形成 (同上, pp. 42-43)。

三、B. 自我心理學的觀點

在精神分析的各種模式中，較重視衝突的是著重自我和驅力角色的古典模式和自我心理學。當代自我心理學的傳承者更加重視衝突，因此被稱為當代衝突理論。當代衝突理論家背離佛洛伊德的結構理論，以便專注於驅力衍生物、焦慮、防禦和超我壓力之間的妥協形成。妥協是衝突的結果，如同衝突一般，妥協無所不在，因為心靈的每個部分都被視為圍繞著妥協形成的結構：即圍繞著衝突。對於當代衝突理論家來說，心智發展更被視為一系列的妥協形成，而不是傳統佛洛伊德的三重結構（原我、自我、超我）。精神分析療癒的目的，是幫助個案理解自己的潛意識衝突，並對於自己如何根據童年的潛意識恐懼來防衛驅力衍生物，能有所洞察。分析師的任務是結構一個分析情境，來促進潛意識衝突和防衛以盡可能明確的方式浮現，並將這種潛意識材料詮釋給個案，以幫助他獲得更具適應的妥協形成 (Abend 2005, 2007; Arlow 1963; Brenner 1982, 2002; Druck et al 2011; Ellman et al 1998)。

自我心理學最初與 Anna Freud、Heinz Hartmann 以及 Ernst Kris、David Rapaport、Erik Erikson 和 Rudolf Lowenstein 關係密切。其他許多人也有重要貢獻，影響後來的理論與技術。他們包含了 R. Waelder、O. Fenichel、E. Jacobson、M. Mahler、H. Nunberg、J. Arlow、C. Brenner、L. Rangell、H. Blum 及其他。Jacob Arlow (1987) 總結了自我心理學家對衝突堅定不移的興趣，在解釋 Anna Freud、Ernst Kris (1950) 及 Heinz Hartmann (1939)，他寫道：「精神分析或許可以被定義為從衝突的角度看人性」(p. 70)。在他對自我心理學和當代結構理論的評論中，Blum (1998) 觀察到自我心理學是「結構理論的誤稱，因此不存在字面上、封裝的『自我心理學』...」(Blum, 1998, p. 31)。自我心理學，反對原我心理學，強調注意精神表面，其為更深層潛意識衝突的衍生和指引。這與對前意識，以及對幻想、夢、和屏幕記憶等之外顯內容的重新關注有關。詮釋被認為是一個序列性的歷程。從表面到深層的詮釋順序，以及「詮釋內容前先詮釋防衛」，強調個案在溝通上阻抗的成分，在二戰後時期提出了延長時間的增量分析。理論植基於結構理論，從原我、自我和超我之間衝突的角度來思考精神裝置，自我在另外兩個基本結構和現實之間進行調解，並逐漸納入起源的、發展的和適應的考慮。

三、Ba. Anna Freud

Anna Freud 在衝突的起源中細膩的闡述防衛過程。即使在 1926 年，衝突顯然包含兩個方面（防衛的內容和防衛過程）佛洛伊德相對更多地關注在防衛的內容上。在 Anna Freud 極具開創性的出版物《自我與防衛機制》中，將防衛過程提升至與衝突的起源中防衛的內容同等的重要位置 (Freud, A, 1936)。

三、 Bb. Hartmann, Kris, Rapaport 與 Erikson

把精神分析視同於一般心理學，並認為核心問題是在適應上，Hartmann (1939, 1975) 也論述了包含在自我之中初級自發性和次級自發性的概念、（相對地）無衝突的領域，和在自我之中，各種自我功能之間的系統內衝突。與 Kris、Rapaport 和 Erikson 同時，Hartmann 闡述了自我的更廣泛功能，包括自我合成和整合功能、中和、昇華、自我認同的發展 (Erikson, 1956) 等。

對應於先前由佛洛伊德對原我的深入研究，現在則是對自我的深入了解。這些早期的創新者將自我視為廣大心智中的一個面向。他們的著作反映了人類心智以及干擾力量間的平衡。透過與個案的自我聯盟，分析師的立場與三個精神基本結構以及外部世界是等距的。雖然精神分析的方法仍然是持續處理衝突 (Freud, A. 1936; Kris, 1947; Hartmann, 1950)，精神分析的理論作為一般理論，並非最小化衝突的重要性，現在則是納入圍繞衝突的行為，也納入獨立於衝突的行為。Hartmann (1950) 指出初級自發性如何能夠參與衝突的形成，而次級自發性如何從衝突中產生並再次成為衝突。

然而，對於一些自我心理學的追隨者而言 (Blanck, 1966; Blanck and Blanck, 1972)，Hartmann 的無衝突領域和自我自發性的概念，似乎表明了自我是獨立於其他精神裝置而存在的。Hartmann 對自我自發性和無衝突領域的獨特概念也促成了另一種將衝突最小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例如：自體心理學，一種發展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缺陷更勝於強調衝突。

三、 Bc. Brenner、Arlow、和 Rangell：現代衝突理論與當代結構理論

Brenner 和 Arlow 擴充了佛洛伊德關於精神形成的概念，其由心智結構（原我、自我和超我）之間的衝突而產生。他們兩人認為實際上所有的精神成果（夢、症狀、幻想、性格和自由聯想）都是衝突的一種產物。甚至是超我，依 Brenner 的看法，是一種或一組妥協形成。用 Brenner 的話來說：「精神生活裡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種妥協形成...是滿足驅力衍生物的一種組合...是以焦慮和憂鬱情感之形式出現的不愉悅...是功用為最小化不愉悅的防衛，是超我的功能...思想、行動、計畫、幻想、夢或症狀都非單純非此即彼。每一個行為、感受或思想皆取決於它們全部...」 (in: Richards, Willick, 1986, pp. 39-40)。

此種複雜的取向影響了分析師的聆聽：

「當分析師帶著回答問題的目的，而不再聆聽病人時：這是願望滿足、防衛或超我？分析師已預知，在每個個案身上，答案是三者皆是。分析師會學著問：『源自童年的哪些願望在此滿足？...它們喚起哪些不愉悅（焦慮或憂鬱情感）？哪個是防衛的面向？哪個是超我的面向？』 (Brenner, in: Richards, Willick, 1986, p. 40)。

建立在佛洛伊德的多元決定論原則和 **Waelder** 的多重功能原則之上，沿續 **Brenner** 和 **Arlow** 的衝突和妥協形成的擴充觀點，**Rangell** 重述了現代版本，稱為精神元素的可互換性原則：精神元素涉入彼此的衝突互動，並且在多重決定的樣態下，合成為新的精神產物，然後二次地再參與進入衝突活動。與合成互補的動力就是分析，它會將精神成果解剖為原始的成分，並追溯退行路徑直到衝突的根源。在生活中，衝突的成分會融合為一種精神成果。此精神成果往往是認知—情緒的集合狀態，其包含初級與次級症狀，並疊加於過去所形成之人格組織 (**Rangell, 1983; Papiasvili, 1995**)。Rangell 對防衛分析有創意和整合的闡述如下：「在分析中，通往健康整合的道路是分化和重新整合，藉由臨床集合物的去分層，並再合成為更穩定適應的整體...」 (**Rangell, 1983, pp. 161**)。這個取向，藉由 **Gray (1994)** 在他「緊密的歷程監督」的分析了移情的防衛面向後，進一步擴充和重新定義。

Rangell (1963, 1967, 1985) 重返下列問題：在一個衝突的系列中，訊號式的焦慮相對於情感，是何者激發防衛。他研究了防衛被激發的前、中、後之顯微過程（在任一精神成果出現之前）而得到下列的結論：無論是哪一種不愉悅的情感本質參與了衝突，用來作為防衛的立即訊號是焦慮。**Rangell** 描述了一種「精神內在歷程」——一種衝動—焦慮—防衛—精神成果的潛意識認知—情感系列，同時間維持認為，焦慮在所有其他不愉悅狀態的背後，仍然是防衛的激發者與動機。此焦慮是關於壓垮了自我的不愉悅。**Rangell** 推測，在自我中有個潛意識決策功能，其最終形塑出特定的精神成果。經由與自體和客體表徵之互動，精神內在的試驗行動（表徵著在自我之中系統內的選擇衝突）發生了。客體為了意圖的宣洩而被評估。自體則是為了危險信號的焦慮感、或安全感和主宰感而被評估。

Rangell (1963) 所描述之持續不斷的顯微衝突序列和內在試驗行動，是普遍存在的背景活動，可能可以從潛意識幻想的觀點來加以研究。**Arlow** 將潛意識幻想及其功能放置於精神內在衝突的研究核心。佛洛伊德視潛意識幻想為潛意識願望的衍生物，**Arlow** 則視其為包含結構衝突所有成分之妥協形成物。如同 **Rangell** 強調顯微衝突過程和試驗行動之持續不斷、普遍存在的特質，**Arlow (1969)** 強調潛意識幻想的持續影響力，其加諸於個體功能的所有面向，包括相對免於衝突的領域。就普遍來說，**Arlow** 認為潛意識幻想提供了可以組織知覺和認知功能的一個心智模組。

談到當代的現代衝突理論者對治療行動的概念化，**Abend (2007)** 注意到移情態度之潛意識組合，對應於環繞在精神分析的設置和過程中之潛意識幻想。基於現代衝突理論的範疇，**Gray (1994)** 對每次治療時段的語言流動之防衛功能所採取的「緊密的歷程監督」，聚焦於以關注著對分析師可能的評斷反應為中心的移情分析。

對於已完成的精神分析之追蹤研究，支持了當代的觀點：衝突永無全然的解決。甚至在接受分析後，衝突仍是個體精神裡活躍且現成的元素。改變的部分是個體的能力，其以更適應的態度來回應喚起的衝突 (**Papiasvili, 1995; Abend, 1998**)。

三、**Bd.** 結構理論裡的客體關係理論和衝突：**Dorpat** 和 **Kernberg**

Theodore Dorpat (1976) 提出一個名詞「客體關係衝突」來描述一種內在衝突，其涉入一種精神結構是較未分化，且早於原我—自我—超我的分化。**Dorpat** 的客體關係

衝突與個體經驗到的對立相關，此對立存在於個體自己的願望與他人的願望之內化表徵之間。舉例來說：「我想這麼做，但會傷及母親」。引用可能的是自我和／或超我缺陷 (Gedo 和 Goldberg, 1973)，以及一種較低階的超我形成 (Sandler, 1960)，Dorpat 強調須以心智的層級模型，來整合了解精神衝突。內在分化的較高層次，涉及了三元模型，在較低層次則涉及客體關係模型，在客體關係模型中的超我未完全被經驗為內在代理人，「分離罪咎感」產生於自體和客體間尚未完全的分離，且表徵的過程並未全然內化。由於 Dorpat 的病人談及「在我頭裡面的母親」，而非與母親實際的互動，這種衝突不能被歸類為外在的或外在化的衝突。

當客體關係更成為關注核心，尚有其他整合自我心理學與客體關係理論的原創性努力，它們也涉及技術的理論。其中一個具影響力的整合是來自北美精神分析界的 Otto Kernberg。近三十年，他的整合逐步發展，尤其適用於前伊底帕斯發展和「更廣的範圍」—邊緣型人格疾患病理，其潛意識精神內在衝突並非僅發生在衝動和防衛之間。在他的文章中，Kernberg (1983; 2015) 闡述了前伊底帕斯衝突是發生在兩組互相對立的全好—全壞之內化客體關係之間。每一組都由受驅力衍生物影響之自體與客體表徵所組成，以情感傾向的形式顯露在臨床上。衝動和防衛，兩者都藉由充滿情感之內化客體關係表現出來。

參考 Fairbairn (1954)，Klein (1952)，Jacobson (1964) 和 Mahler (Mahler, Pine and Bergman, 1975)，Kernberg 假定自體和他者之間有意義關係的內化，是以自體和客體表徵的雙元單位形式，來作為基本建材，並以它們被經驗到的情感來連結，建構為心智的基本基礎結構。這些雙元單位的鞏固和逐漸整合成更複雜而超常的結構，導致自我、超我和原我之三結構的發展。此基本內化的自體／客體表徵的雙元，被構想為深嵌於高峰情感狀態中，正向與負向兼具，各自分別地決定了「全好」和「全壞」，「理想化的」和「迫害的」的心智結構。

在結構理論裡的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理論，意味著兩個基本的發展層次。

第一個層次，在高峰情感狀態的主宰下，一個雙元精神結構被建立起來。一方面，是由理想化的自體—表徵所組成的一種精神結構，其關連於理想化的他者（嬰兒和母親），並受強烈正向、緊密的情感狀態所主宰；另一方面，關係雙元組的對立方，則在強烈負向、反感的、痛苦的情感主宰下發展，並由挫折的或攻擊的他者表徵所組成，其關連於一種挫折的、氣憤的或受苦的自體—表徵 (Kernberg, 2004)。內化全好的，並與全壞的內化客體關係完全隔開的概念，導向一種精神之內的結構，其以原始解離或「分裂」機制為特徵。相反於在高峰情感狀態下的早期發展，在相對低情感狀態下的早期發展，則會在可運用的認知功能控制下演化，本能的（「尋找」系統）衝動會學習到現實，並導向及早瞭解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現實。在這些早期情境下，尚未存在一個整合的自體感，亦無能力以整合觀點看待有意義的他者。

發展的第二個層次，在生命頭三年逐漸顯露，對周遭世界之現實的認知理解會進展，特別是當好的經驗勝過壞的經驗，這會促進情緒上對立狀況的逐漸整合，也會促進同時知覺到好與壞的經驗並存的耐受力。對於矛盾、對於同一外在客體兼有正向與負向情緒關係之耐受力的發展，會逐漸導向一種自體和有意義他者的整合感；或者，換句話說，導向正常的自我認同。自我認同相當於自體的整合感，與有能力以一種整合觀點看待有意義他者。

這個發展的第二個層次相當於克萊恩學派理論架構裡的「憂鬱位置」。它標誌了正常心理功能的發展或精神官能層次結構之病理。反之，性格結構的邊緣性層次之典型病理發展，相當於 Klein 的「偏執—分裂位置」，是缺乏達成正常認同整合之後果的代表。邊緣性人格結構，一種嚴重程度的人格疾患，實際上，其特徵為缺乏認同整合或是認同擴散之症候群，持續顯著的原始防衛的運作圍繞著分裂，並且在現實感上有某些侷限，可見諸於人際功能隱微面向的缺失。

精神分析的客體關係理論認為，從邊緣性人格結構轉變成精神官能的和正常的人格結構時，防衛機轉也會由以原始防衛為主，轉向以潛抑及其相關機制為中心的進階防衛，包括更高層次的投射、否定、合理化和反向作用。這種進階的發展，反映在被潛抑的、動態的潛意識，或「原我」的明確表現上，它是由無法接受的內化二元關係所構成，反映出不能忍受的原始攻擊和嬰兒性特質。這時候的自我，包含了整合的、有意識的自我概念，以及重要他人的表徵，並伴隨具有昇華功能的發展，合適的表達出關於性、依賴、自主、積極自我肯定之情感的情緒需求。內化的客體關係，包含了嬰兒和兒童與其早年心理社會環境，特別是父母，互動時的道德規範要求和禁律，被整合入「超自我」之中。此結構會由多層的內化禁律和理想化要求所組成，並明顯地轉化為一種人格化、抽象化和個體化的個人道德系統 (Kernberg, 2012a, b; Kernberg, 2004)。

Kernberg 的當代綜合工作 (Kernberg, 2015)，包含了將前述發展的與病態的衝突組態的神經生物學上的各種基礎作關聯。「有關神經生物學情感系統和認知系統—最終由遺傳因素控制，和心理動力系統—最終反應出內在和外在關係的真實以及有動機的扭曲，兩系統之間並行與相互影響的發展，所作出的一般性結論...」 (Kernberg, 2015, p. 38)。

該理論中的一般性假設是，有邊緣性人格結構的患者，呈現了早期經驗的侵略的與迫害的面向，無論其來源為何，都阻礙了他的認同整合。旨在完成認同整合的分析治療，將允許自體概念整合，以增加認知的控制；將他人概念整合，以讓社會生活正常化，並且也整合矛盾的情感之經驗，以引導情感調節和減少衝動。依據這些假設，聚焦於移情的心理治療的策略，是在每個由情感支配的時刻，無論是正面和負面的經歷，來闡明治療情境（移情）中所激活的客體關係。它都會促進患者對其衝突的心理狀態之容忍和覺察。透過對心智狀態的澄清和最終的詮釋，會讓分裂運作主導的解離心智狀態，可以心智化。在治療情境中，激活的分裂出之客體關係往往會在移情時產生「角色倒置」。換句話說，會在患者與治療師的關係中體驗到自體和客體的角色交換。在這個過程，患者會逐漸地接受他與受害者和迫害者這兩者的潛意識認同，同時，理解他的理想化也具有不切實際的特質，並且展現出保護功能以對抗他經驗中對立、負向的部分。治療師在保護治療框架的同時，也保持技術的中立，漸進地引入「三人心理學」。在這裡，治療師的功能就像是「被排拒在外」的局外人，他幫助患者診斷其分裂出之理想化的和迫害的狀態。這些狀態，在隨後可能會與移情中激活的客體關係所隱喻的意義，連結在一起 (Kernberg, 2015)。

三、C. Melanie Klein 和 Post-Kleinians

在克萊恩學派中，衝突也是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但它起始於生命的最初階段，是在心智的三方結構鞏固之前。這三個新興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由原我的潛意識衝動和自我的防衛所造成的衝突所引發，經由超我的壓力強化，可以回溯到非常早期層次的發展，並且有助於精神結構的建構。通過分裂、投射性認同、否定和無所不能的控制，理想化的愛與破壞的攻擊之間的掙扎，從一開始就是精神生活的特徵，從而產生了精神生活的基石，即偏執—分裂和憂鬱位置的原始防禦群集。這種動力突顯了，在將原我、自我和超我鞏固為三個明顯不同的結構之前，發生了更深層面的潛意識衝突。對於克萊恩學派和後克萊恩學派分析師來說，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作用的潛意識衝突的觀點，已經證明有助於澄清和治療地剖析固著在原始發展層次的嚴重的精神病理學（如：邊緣性人格結構、自戀病理、性倒錯、飲食疾患、反社會行為），其中分裂和其他原始防衛機制占據了主導地位 (Kernberg 2005)。這種觀點意味著潛意識衝突涉及任何情感心理結構，無論是由內化客體關係表示的原始結構還是高級結構，而此高級結構是由三方結構將其內化的客體關係元素融入至原我-本我-超我結構所構築 (Joseph 1989; Klein 1928; Segal 1962; Segal and Britton 1981; Steiner 2005)。

與自我心理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Melanie Klein 擴展了佛洛伊德認為心靈是天生矛盾的觀點，發展她自己的客體關係理論。Klein 關於客體關係的開創性論文出現於 1935 年，與 Anna Freud 1936 年的著作和 Hartmann 1937 年的論文（1939 年出版）有時間順序的關係。當 Anna Freud 和 Hartmann 把焦點放在自我的特徵，以及自我如何在適應外部現實的同時，防衛自我不受本我的影響時，Klein 正在深入探討內在世界的深度，以及它如何與外在世界相互作用，並且擴展了佛洛伊德的超我的觀點。有趣的是，在 1950 年代寫的幾篇論文中，「自我心理學—佛洛伊德」與「客體關係—佛洛伊德」之間發生了分歧。首先，在 1952 年的國際精神分析大會上，舉辦了一場關於「自我發展與原我的相互影響」的研討會。在那裡，Klein 說：「由於自我和超我的發展，與內攝和投射的過程密切相關，它們從一開始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由於它們的發展受到本能驅力的極大影響，所以心智的三個區域都是從生命的開始就有最近距離的互動。我了解到，在這裡講述心智的三個區域時，我並沒有保持在建議討論的主題之中；但是我對最早的嬰兒期的概念，使我不可能完全只考慮自我和原我的相互影響」 (Klein, 1952, p. 59)。

因此，當自我心理學主要關注自我與原我的關係，以及自我如何導航適應外在世界時，Klein 的客體關係理論則注重自我與超我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是如何由本能衝動與超我的內在客體之間形構的聯繫所決定。幾年後，David Rapaport (1957) 評論了這種差異：「自佛洛伊德引入結構理論以來，理論的興趣一直集中於自我心理學，而忽略了對超我的探索。」 (Rapaport, 1957/1977, p. 686)。

Klein 的理論在她 1928 年的論文中首次出現分界點，題目為〈伊底帕斯衝突的早期階段〉。將佛洛伊德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稱為「衝突」，Klein 認為，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伊底帕斯情結（對佛洛伊德來說，是發生在三至五歲之間性器期）的更早期，聚焦於口腔和肛門議題的心性階段中，就已有情結前驅物存在。對於 Klein 來說，伊底帕斯衝突始於生命的第一年，並且沒有「前伊底帕斯」或「衝突前」的階段。

這帶來了重要的概念議題。例如，伊底帕斯情結基本上象徵著自此之後任何關係的三角結構，因為從嬰兒意識到父親和母親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個三角結構存

在。然而，Hanna Segal (1997) 指出，一旦嬰兒做出一個組織決策，將對於母親的好經驗與令人沮喪的經驗分開，就會有一個嬰兒，一個好媽媽和一個壞媽媽的三角結構。這種組織的形式，Klein 稱之為分裂，這是早期（及後期）精神管理衝突的主要方式之一。將客體分成兩部分，或者將不同客體們分成好的和壞的類別，是組織個人世界的主要形式。分裂功能與投射認同相結合，在幻想中通過將它們從內在世界投射到外部，來消除心智中不相容的元素。

分裂和投射認同都被用於管理一個人的內在和外在世界。隨著相應的內攝認同，這些過程形成了一個活躍的心智-社會環路，其中蘊含著處理衝突以及執行正常的心智功能。這種生命中投射的和內攝的循環，就和呼吸的吸氣和呼氣類似，表現出 Klein 對於精神衝突的天生本質與重要心智功能連結的觀念。在這個過程中，自我形成了和原我中生存與死亡的衝突本能的初始關係。在初始尋找外在客體以幫助其生存的努力中，嬰兒在幻想中——也就是 Klein 和 Susan Isaacs (1952, p. 58) 所說的是本能的心智推論——對於其外在客體投射出本能的衝動，然後，將與幻想客體混合的實際外在客體的這種組合內攝入超我，之後，它如同於內在客體的功能。隨後，Klein 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內在客體與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上，以及——或許最重要的——關注它們與自我之間的關係。

要理解 Klein 對於衝突的觀念的複雜性，至關重要的是要看到作為本能化身的內在客體。因此，生與死的本能慾望之間的衝突，造成了互相衝突的理想的與迫害的內在客體，而自我必須與之形成關係。對 Klein 來說，分析自我與內在客體（超我）的關係，是她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因為它是以圍繞著不可避免的衝突作為前提之下所形成，並從這個核心要素中汲取了她的整個理論。

第一次衝突是與生俱來的，生與死的本能以及他們對愛與恨的情感表現，即通過投射的循環而進入外在世界，然後，再內攝到內在世界，創造出佛洛伊德所謂的情感矛盾。生與死的慾望創造了愛與恨的情感，反過來又創造出好的與壞的、理想的與迫害的客體，這些客體往往與真實的外在客體相衝突。然後，我們就會產生本能衝突，情緒衝突、以及內在客體的衝突，因而這會導致自我內的衝突，如同自我與外在客體之間的衝突，後者可被稱之為幻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從這些固有的衝突中，Klein 才形成了在兩個不同心智位置之間的一種發展理論。理解這兩種心智位置的最直接方式，是去考慮它們的概念化是圍繞在精神生活中的單一基本議題——愛。Klein 的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愛的理論，以及愛如何在一種也會產生仇恨的心靈中存活下來。

以上形成了心智發展的主要衝突。人們可以透過參照許多 Klein 取向的思想家，來理解 Klein 思想中一個關鍵性且未被說出的假設，那就是：恨比愛更容易。考慮一棟建築物，構造一個結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它可以在一分鐘內被夷為平地。建構是複雜的；破壞卻是簡單的。愛一個令人沮喪的客體，需要一個複雜的發展；恨一個令人沮喪的客體，並不需要發展。從這個理解來看，Klein 的理論認知到，在未發展的心智，雖然愛從一開始就存在，當恨伴隨著出現時，就主宰著愛。相比之下，當心智發展超越這種本能狀態時，愛就能夠主宰恨。Klein 將這些心智-情緒形構分別命名為偏執-分裂位置與憂鬱位置，並將它們置於發展關係之中；偏執-分裂位置先發生，憂鬱位置隨後跟著發展。區分這兩種位置的基本定義要素是，一個人如何概念化客體並與其互動。在偏執位置中，一個人主要關注的是自己的生存，一個人的客體被認為可

能幫助或威脅到一個人的生存。由於這個因素，Klein 認為偏執位置是一種自戀的位置。憂鬱位置所定義的客體關係，將對客體生存的關注，看得比自體的生存更加重要，或至少相等；因為人們理解到，如果沒有與另一個人的關係，是無法生存的。

每個位置所使用的名詞，反映它所涉及的防衛之本質。投射性認同也是一種組織原則，因為它在地形學上將不同的客體放置在不同的地方，以避免它們之間的衝突。偏執分裂防衛的本質是它們被用來喚起一種全能感，就像是無所不能的將現實加以否認，特別是具有情感的客體關係之現實。憂鬱位置涉及其自身的衝突感受，在這裡，愛與恨之間的衝突開始在所愛客體的這一方得到解決。潛意識幻想全能地運作，直到與現實建立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是創造力的發生一樣，未能夠與他人所經驗的現實進行溝通的潛意識幻想，往往會產生失敗的藝術形式。

處於憂鬱位置時必須放棄全能，以便能夠認識到客體的現實、分離和獨特。這需要忍受住罪疚，因為罪疚是衝突的情緒中最顯著的。罪疚產生於欲望與現實衝突的交叉點。罪疚是一個人對其非理性與反社會性的原始欲望的認識；它代表了認識客體的重要性，以及客體與個人欲望分離的時刻。罪疚感調解了自戀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也調解了內在和外在外在衝突。當個體對其客體的愛和罪疚無法被容忍的時候，Klein 提出了第三個心智位置的理論：躁狂位置，它與憂鬱位置是相衝突的，它是一種對客體的蔑視，企圖控制客體，並且透過否認其重要性的方式來勝過所需要的客體。在與重視愛勝過恨的憂鬱位置相衝突的情況下，躁狂位置退行到使用偏執分裂的防衛，以對抗愛的罪疚與痛苦。

最後，對於 Klein 的衝突理論，必須要提到發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間的競技。這方面涉及 Herbert Rosenfeld (1964) 和 Donald Meltzer (1966) 將投射性認同納入內在客體的觀點。根據 Rosenfeld 的說法，超我通常一如幫派的功能——比如黑手黨或納粹般——試圖控制和懲罰自我，只因為他們的不完美。這是自我與超我之間精神上的主要衝突的一種表現。自我最初弱小而無助，就像嬰兒一樣；在這種狀態之下，自我對客體有一個巨大的需要，好幫助它存活下來。這個被需要的客體被賦予全能的特質，以彌補自我對無力自我照顧的恐懼。正如佛洛伊德的理論一樣，Klein 相信自我在全能的光照之下，創造了它對客體的初始視角。超我使自我相信：它擁有一個無所不能的客體，即便它意識到它本身並不是全能的；它的超我也可以是全能的。這導致自我消除其自身的分離存在，並與其幻想中的全能內在客體相融合，從而投射性認同其內在客體。在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中，自我放棄其自身的獨立性，以感受一種全能的保護。因此，藉由輕輕一揮投射性認同的魔杖，自我試圖解決其生與死的本能，愛與恨的情緒，以及全能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三、D. Wilfred R. Bion

當 Klein 將佛洛伊德的衝突概念，擴展到將內在與外在客體關係包含在內，Bion (1955) 則將衝突理論擴展到心智功能領域。在他的早期階段，Bion (1957) 以生死本能為基礎，分別將心智中健康和精神病部分的根本衝突加以理論化。心智中精神病的部分不想要了解現實，包括外在現實以及最重要的內在現實。Klein 認為心智透過分裂機制來處理衝突，Bion (1959) 則提到了一種更原始和破壞的機制，他稱之為「攻擊聯結」。攻擊兩個客體或心智中的兩個部分之間的聯結，是一種透過消除所有可能使兩個分離的客體彼此接觸的連接物，來處理衝突的一種精神病式的方法。

Bion 的理論乃基於他對原始衝突的概念。正如他所說，「問題在於解決自戀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Bion, 1962a, p.118)，這是他重述佛洛伊德自戀客體關係和健康的客體選擇之間的張力；而 Klein 則是以偏執分裂位置與憂鬱位置來加以區別。造成攻擊聯結的潛在衝突，是融合與分離之間的衝突，這個想法導致 Bion (1963) 修改了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對 Bion 來說，伊底帕斯情結，並非如同是在 Laius 和 Oedipus 之間，也不是在性與謀殺之間，引發了一個衝突；而是在尋找真相和忽視真相之間，在 Tiresias (這位知道真相的盲人先知) 和 Oedipus 之間的衝突。

Bion 在他的著作《從經驗中學習》(1962b) 與《精神分析的元素》(1963) 中，進一步理論化此一衝突，他寫道，一個人可以有三種與客體產生連結的方式：L (愛)，H (恨) 和 K (認識)。L 和 H 是伊底帕斯情結的傳統面向；K 是 Bion 另一個原創概念。在這裡，Bion 概念化了一個由 K 和負 K 之間心智功能的巨大衝突所支配的反連結世界；在建立連結和認識的欲望，以及攻擊聯結和拒絕認識的欲望之間，這些關聯到生和死的本能。Bion 透過將本能衝突轉化為 K 和負 K 之間類似的心智衝突，來實現對佛洛伊德和 Klein 理論的補充。人們可以在 Bion 於 1955 年的論文〈精神分裂的語言〉中看到這一點，在那裡他重新詮釋佛洛伊德的閹割情結 (對失去一個人的生殖器的恐懼) 也發生在自我之中，從《從經驗中學習》與《精神分析的元素》裡的觀點來看，與思考有關的自我心智功能的閹割，受到負 K 的影響。

隨著 Bion 的思想發展，K 和負 K 之間的衝突擴展到更大的真理與謊言的範疇。而這反過來與 Bion 的經驗概念聯繫在一起 (Bion, 1959, 1962b)。擁有、參與並在個人經驗中受苦，代表的是一個人的能力或才能，經驗成為了真理的熔爐。對於 Bion 來說，理性並非真理，經驗才是，而這意味著一個人的情緒經驗。Bion 的早期工作，著重在發展能思考一個人的情緒經驗的能力，而他後來的工作則將注意力集中在能夠擁有一種情感經驗，又或者自相矛盾的是，能夠經驗一個人的經驗。Bion (1965, 1970) 將這種狀態與 K 區分開來，其名稱為 O。K 代表認識到一個人的經驗，而 O 則指涉了我們是誰的最深層次，那是永遠無法透過有意識的心智所完全理解，但是可以被經驗到的層次。O 代表一種未知。發生在 K 和 O 之間的衝突，也是存在與認識之間的衝突 (Taylor, 2011; Tabakin, 2015)。後來 Bion 取向者所思考的衝突，是屬於已知與未知、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衝突。

Bion 對於實現其浮現的臨床美學的分析立場，需要分析師的一個新立場。他擴展佛洛伊德 (1912) 關於平均懸浮注意力的技術觀點，以及對於病人的材料所帶來之任何可能的客觀接納，Bion 建議開發一種嶄新的心智狀態，一種對神遊的開放，這需要將牽連到記憶和欲望的「認識」元素保持懸浮，於是分析師可能獲得的一種心智狀態，它被理論化為詩人 Keat 所定義的「『無為之功』，有此才者身處無定、神秘、疑惑之境，不會急躁地追究事實與理由」(此處採余光中譯本) (Bion, 1970, p.125)。通過這種方式，Bion 可以被視為朝向辯證式的解決內在衝突，以 Hegal 的術語來說 (Rosen, 2014, pp. 138-9)，是一種揚棄先天衝突的解方，藉此，人們發展出一種心智狀態，可以容忍 PS (偏執分裂) 和 D (憂鬱) 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 Bion 所形構的 $PS \leftrightarrow D$ 。後期 Bion 並未因這種浮現而將衝突的假設忘記；這個浮現，更精確地說，是被放置於和衝突的一種辯證關係。

三、E. Donald W. Winnicott

Winnicott 提出了一個有異於心智衝突模型的客體關係論述。在 1930 年至 1950 年中期，他所著述的著作合集《從小兒科到精神分析》中，Winnicott (1978) 將「原發的母性專注」、創傷、退行、移情與反移情等，與早期兒童發展的動力與兒童神經症連結，漸進地在該領域中作出貢獻。Winnicott 將模型的起始點，設定在命名為未整合的原初發展階段的概念上 (Winnicott, 1945)。相較於 Klein 傾向從分裂、投射性認同，與其它源自嬰兒全能感的各種防衛，來檢視早期心智為何會出現失去整合的現象，Winnicott 則認為，人類早期心智乃是處於一種尚未集結融匯的狀態。因此這樣的心智對 Winnicott 而言，並非處在基本衝突的開始狀態，反而比較是在需要經過集結整合的狀態，之後才會導致佛洛伊德或 Klein 所說的衝突。在 Winnicott 眼中，在這個原初整合過程發生前，並沒有精神結構這件事。由上可見，Winnicott 的觀點，與佛洛伊德、Klein、Bion 幾位認為，在經歷生死經驗後，便能從原我衍生出原初本能衝突與情緒衝突的理論，是背道而馳的。相較上述對於原初衝突的想法，Winnicott 建議的是一種原初「未整合」的狀態，直到原初整合過程能夠發生之後，衝突才能加入。因此，對 Winnicott 而言，並無所謂「原我存在於自我之前」的說法 (Winnicott, 1962, p. 56)。他認為，倘若沒有一個夠好的母親去提供一個抱持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而允許嬰兒將自身各種部分，開始整合進入一個原初自我，則自我的發展是無法展開的。然後，也只有這個然後，進行象徵形成的程序，「個人精神內容」的組織化開始，形成「生活關係」的一個基礎 (Winnicott, 1960, p. 45)。如 Winnicott 指出，在這個階段「嬰兒尚未成為一個持有經驗的存在個體」(1962, p. 56)。而 Klein 對此則抱持相反的觀點，她相信有一個早期的自我，已經對於現實有部分覺察，而投射或內攝的歷程，更是在出生之際即開始產生作用。對她而言，嬰兒在這個階段就已經在經驗這些了。

由 Winnicott 在 1950 年晚期至 1960 年初期所撰寫的論文收集而成的第二本著作《成熟過程與促長環境》中 (Winnicott, 1965)，他完全聚焦於成熟的過程，必須有一個進一步伴隨而促進其成長的環境。Winnicott (1960) 評論到，Klein 在某種意義上，同樣承認環境對於最初發展階段的重要性，其說法為「她對於分裂的防衛機制、投射與內攝等方面的探討，是在嘗試說明不合適的環境供給，對個案所能造成的影響」(p. 50)。但是對於 Winnicott 來說，沒有一個個人是不需要環境的。當佛洛伊德、Klein 與 Bion 發掘到伊底帕斯情境的複雜性時，Winnicott 已在概念化一種前伊底帕斯狀態的存有，認為嬰兒與母親打從最開始便是一個單一的單位。因此 Winnicott 聚焦在環境匱乏，而非固有的衝突。Winnicott 最為關心的是，嬰兒（前伊底帕斯）的存有狀態。對他而言，成長主要是建立在存有與持續性上，並非本質地取決於衝突和其解決方案上。

三、F. 自體心理學，關係的與互為主體的視角

在其它精神分析模式中—主要是指那些以自體與客體關係為基礎者—在理解精神病理學與進行分析治療時，關於衝突議題的地位較為次要 (Busch 2005; Canestri 2005; Smith 2005)。在這種模式中，在解釋嚴重精神病理學時所考慮的，是在早期未分化發展階段中所發生的缺陷，而非衝突。

自體心理學和後自體心理學的發展 (Kohut 1977; Ornstein and Ornstein 2005)，如同關係學派的與互為主體的學派 (Harris 2005)，對潛意識精神內在衝突的中心性提出質

疑；反而，他們將嚴重的精神病理學歸因於精神缺陷，因此將精神病理學的起源，延伸至發展的階段，在自體表徵與客體表徵兩者的分化尚未被建立之前。

因此，原先關於衝突發展的三個精神結構的區分（原我、自我、超我），也變成錯誤。從這個觀點來看，病理過程中所謂在危急關頭的種種需求，主要涉及的是發展的各種失敗，例如：創傷性的受苦、失落，以及較常見的，因為欠缺能作出情緒反應的客體而損害了自我結構的發展；這樣的結果，遠比因為原慾或攻擊驅力衍生物所造成的損害更加嚴重。

與將發生於各系統間（系統間）的衝突作為基礎的病理學相迥異，把缺陷當作基礎的病理學，其所指的是自體結構（系統內）的失敗。考慮到發展的失敗與缺陷的病理學，在後佛洛伊德學派與後克萊恩學派，廣泛被共同使用。即便並未全然否決衝突，這樣的考慮仍舊挑戰著傳統理論中，處於壟斷地位的衝突的概念。衝突的概念不再像從前一樣重要，而對其重要性的降低影響最劇的，是聚焦於真實客體所扮演角色，藉由一種創傷關係而導致功能的缺陷，會造成精神結構建構時的損害。這個觀點在兒童創傷領域獲得大量的數據支持。

對眾多當代精神分析學派來說，他們並未對衝突概念有過多的排拒，但衝突概念被缺陷概念以某種方式邊緣化和填補，從而擴展對於精神病理學的理解範疇與相關的臨床技術。擴展在精神病理學方面的理解範疇為（亦即設想精神的受苦，並非只是單純的衝突產物，同時也是圍繞一個受傷自體結構的組織化）使得相對應的古典精神分析方法得到擴展：雖然擴展是建立在辨識衝突、接著詮釋並修通，但由缺陷議題所激發的分析策略並未打算探詢或揭開被潛抑的意義，並且克服阻抗，反而去幫助自我建立意義，並且感受事物所擁有存在的品質 (Killingmo 1989)。

過去三十年間，在人際的、互為主體的與關係學派的視角發展出了各式觀點，人們對於衝突之存在與功能上曾給予極大的關注。它們可能是，從內在或外部所衍生的，互為主體的或有相互關係的，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跨世代的關係。

關係理論在個體與文化許多層面的遭遇，發現了衝突的潛力。在個體被周圍文化吸引、被影響、或是在抗拒時，衝突是很可能出現的；尤其是這樣的案例，當個體佔據了任何非常態身分和個人特質的各種形式（種族、階級、性傾向、失能、文化、性別），或個體被上述任何形式所佔據時。有爭議的認同型式，是面對個案時許多臨床考量的首要重點，透過個案的痛苦以及在移情與反移情模型中的困難表現出來。

Mitchell (1988) 在他所著的《精神分析中的關係概念：整合》書中，詳細說明那些源自與重要他者間的種種衝突經驗，並因此形成的不同的關係型態之各種衝突。數年後在一篇〈評註〉中，他提到勿要簡化：「...說到我對衝突的看法，例如這個人與其他人在他或她的環境中發生衝突，就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失實陳述。事實上，我在 1988 年的那本著作中，最核心的點就是要去區分各種關係理論中集中於發展抑制與關係衝突的理論...」 (Mitchell, 1995, p. 577)。在 Dimen (2003)、Layton (1998)、Harris (2005)、Corbett (2001a, 2001b)、Golder (2003)，以及其他專家的工作中，衝突總是座落在系統內和系統之間，不論是政治或個人，社會或是精神。受到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與酷兒理論影響的這種觀點，有一種固有的衝突存在於社會監理制度和 support 個別化與健康制度之間，它也存在於規範與自由之間。像這樣的矛盾，有時在政治理論中會被視為

是階級、種族、文化或性別的結構性衝突，而分析師也經常會經驗到這樣的反移情衝突。

按照 Harris (2005) 的看法，許多後現代主義的分析師，致力於去了解由悖論或衝突出發的一種特定眼光，這其中一些看似不同，但實則相互關聯的自體狀態，是能夠並存的—比如那些療癒者，精神分析取向的警官，理論的主體和客體，特定文化、次群體或家庭的主體，或是受特定文化、次群體或家庭支配的主體。從許多理論視角來看，衝突（互為主體的、內在精神的、與共演的）是改變過程本身中的一員。衝突是發展變遷中固有的部份，這樣的變遷（巨大或微小），隨者那些強而有力的不安定經驗而改變。改變本身就是一個潛在非常複雜的衝突狀態：它是多向且不穩定的。從精神的或關係的轉變的條件中浮現的種種衝突，是來自於許多不同的情感狀態與關係的頂點。

一個中心的想法是，處於衝突中的這個人，感覺是被兩件不可能作到的「差事」抓住 (Apprey, 2015)。成長將會導致分離，與已逝或正在消亡中的客體分離，會感覺到令人難以承受。改變可以被視為是以下這樣的時刻，當一個超過精神任務和心智自由的衝突，創造出一個危險的掙扎點或甚至是僵局時，無論我們想稱這個時刻為混沌的深淵或是邊緣，或是一個充滿了戲劇性恐懼的分離旅程，對某些人而言，也或許對所有病人的某些方面而言，這個是最大衝突與危險的點。在分析進程的起伏中，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改變，當精神的轉變開始或是變得更強烈時，我們也能看見逆行與恐慌。Willy 和 Madeleine Barangers (2006, 2009a,b) 的場域理論中的螺旋性歷程的概念，與 Bion (1965) 的災難論與轉化論，都呈現了關係取向的重要根基。改變的災難 (Goldberg, 2008)，和變動與精神轉移的形態，兩者都可被視為是哀悼的地點與在哀悼過程中的僵局的地點。

這些想法與 J. Henri Rey 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概念有所連結。在其發表的文章〈病人帶進分析中的事〉(Rey, 1988) 中，Rey 主張患者在治療中可能會發掘到一些被隱匿的議程（像 Apprey (2015) 說的差事）這些在過去，曾被用在修復受傷客體的目的上，而現在則成了正在消亡或已受損的內在世界的一部分，簡言之：只要（內在幻想的）客體被修復，病人就會有所改變。而這些事件，就是許多治療過程中，會被顯露的衝突困境。另外，基於關係理論的精神，談到反移情作用的潛力與分析師主觀性時，我們也可用 J. Henri Rey 的視角去看分析師的潛意識運作過程。分析歷程中，當分析師在質疑人是否因抗拒改變而產生焦慮，亦或是那些帶有衝突色彩的決定是否令成長過程變調的同時，我們同樣必須檢視在分析師的反移情中，是否也存在著如此的恐懼與衝突。關係學派分析師非常聚焦在反移情的部門，以及分析師的處置在中斷與／或促進病人的精神改變時的有力方法。

當閱讀關係理論相關著作的時候，注意看一下衝突的功能與位置，相當重要的是會注意到，其它的專有名詞與其他概念的搶先佔據，填滿了衝突可能出現的理論空間。舉例來說，Dimen (2003) 與 Hoffman (1998) 就偏好使用辯證一詞。他們兩位對於在特定對立狀況下產生的張力非常感興趣，這種張力主要是在分析師與被分析對象之間，但也同時存在於這一對的任何一位的內在。在這裡必須要強調，對立並非在於意見不合或是因為雙方有所差異；相反的，透過形形色色的互動，精神內在的衝突可以被觸發與發展，反之亦然。精神內在的衝突會帶出人際關係中與他人的外在衝突。對

Hoffman (1998) 而言，衝突的根本來源，並非是性或是攻擊，而是我們和死亡之深層的衝突關係。有一個顯著的類比，在「按照書本指示去作」與自發性地去作之間的衝突（從一開始，對分析師來說就是內在的），對照到一個處於伊底帕斯敵對與所愛的客體之間的孩子所經驗到的衝突。這種類比對認為性與攻擊是衝突的核心的觀點的任何一位分析師，未嘗不是一種啟發，雖然這些衝突是爆發在情感的轉換狀態 (Spezzano, 1998)，是爆發在互為主體性的空間內 (Benjamin 1995, 1998)，或是爆發在關係的聚集處 (Davies 1998, 2001)。

Benjamin (1998) 主張，對於精神內在與人際間的一種流動性的、移動性的重視，藉此，動機可以同時存在於人際間的層次，也能被運用在連結和自戀的需求。若說這是一個雙重理論，那它就是一個客體關係的／關係的理論。因此，辯證一詞是較被喜歡用的而不是修辭一詞。對 Hoffman 與 Dimen 來說，辯證一詞掌握了衝突經驗中變化多端的特質中的對話性、積極性以及互動性的面向。辯證法提供了在各種選擇之間的一種對話的觀念，提供了多重聲音的一種登記，不管是合唱的、合聲的、無調性的、或是呼喊和回應的種類。對 Dimen 而言，在性特質的範疇內，衝突的生活之形式和功能，表明了豐饒、驚奇、過量、和不可簡化的麻煩。

另一方面，在 Stern (1997) 的書中，衝突被降級為一個註腳，作者解釋說，沒有明確使用衝突一詞，就表明它被用作一種背景假設，相較於精神經驗的變化狀態，它不是那麼重要。這非常類似於 Bromberg (1998) 和 Davies (1998, 2001) 的說法。對於 Bromberg 而言，衝突通常出現在解離的脈絡下（見 Smith 2000a，討論了在 Bromberg 工作中，解離和衝突之間的交互作用、和兩者之間的差異）。Bromberg 的工作模式強調了拓展經驗關係的範圍，使衝突變成可以識別。Stern 認為衝突是一項成就，因為它預示著非自體成為自體的那一刻。當原先已解離的素材一旦可能發生衝突時，在新興形成的自體狀態和其他的自體狀態即可進行協商。先前無法被思考的，現變成可思考和感受，也可以考慮要如何應對。在此之前，當那些素材是被解離的，它既不會被思考，也不會被感受到，所以如何處理它甚至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在隨後的出版物中，特別是在 2004 年〈眼睛看到自己〉一文中，Stern 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以解離為基石的心智理論來看，衝突是一種成就，而不是必然性。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潛意識的衝突則被視為不可能發生。潛意識是未成形的，在潛意識中沒有足夠的結構去對其他事物發生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潛意識幻想的概念，如果應用於任何同時是潛意識，同時又要結構的事物時，則此概念可能需要修改。

如果潛意識是未成形的，那麼潛意識的意義就不是一種形式或一種結構，而是一種潛能—可能成為有意識的經驗。這個概念和解離有關，在 Stern 的參考架構中，出於潛意識防衛的原因，是潛意識堅持在潛在或未成形的狀態下維持經驗。解離是潛意識地拒絕去思考、去創造意義。因此，解離經驗根本無法與心智的任何其他部分發生衝突，因為它尚未達到一種象徵的形式或在可發生衝突情境中體現。

衝突是存在兩個人之間，而不是在於個別的心智中。兩人的心智就像一塊斷得乾淨整齊的盤子的兩個部分：它們可以嵌合在一起，但每個夥伴只有其中一個部分。在消除共演的過程中，外部衝突變成一個參與者心智的內在衝突，並在另一個心智中引發類似的發展。內部衝突首次以這種方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麼有意識的衝突是一項成就。

Stern, Davies 和 Bromberg 將衝突置於多重和不斷變化的自體狀態的一種模式中，在這種模式中，衝突存在於解離和不連續的經驗中，在持續存在中的斷裂處存在。通過建立一個人際關係場域，使得被分析者可以容忍被他人看到，並且可以借用或吸收這種觀察的能力，因而在 Bromberg 式的治療中，理解內在衝突是有可能被做到的。

察覺衝突是這種關係工作的一個新興特徵，需要建立人際安全的條件，使解離的材料能夠被察覺到。Davies 對潛意識衝突的關注，是對認同的變換形式（部分和整體）的細微調整，這些在分析關係中是以各種排列組合發揮作用。她的代表性譬喻之一是萬花筒的意象，暗示了各式各樣認同千變萬化、不停改變的經驗，以及由衝突經驗引入的微妙變化導致徹底的重組。衝突是存在於這些變動狀態之間。

在 Aron (1996) 關於共同意義創造概念的衝突可以來自兩個源頭：來自互動和象徵的主體性的經驗分歧，或是來自各種互動中產生的認可和孤獨的經驗 (Benjamin 1995, 1998; Slavin 和 Kriegman 1992)。從 Aron 的角度來看，一種急性衝突是位於分析師和被分析者的人際關係和精神內在世界中，這就是認可的願望，與追求突出、獨特性和分離的願望之間的衝突。事實上，這比較不是願望的衝突，而是關係交易的衝突，是關係典範之間的衝突。任何衝突理論都必須包含一些動機理論 (Harris 2005)。作為關係觀點的基礎理論家之一，Greenberg (1991) 認為需要保留驅力概念來談論功能。Mitchell (1997, 2000) 的工作遵循了類似於 Fairbairn 關係衝突模型的軌跡，轉向了 Loewald 對依附和發展的興趣。Mitchell 的觀點是，一個人不是被捲入，而是早就一直被嵌入在互動矩陣中。

或許，關係主義者不會避開驅力理論，但有人可能會說—根據 Ghent (2002) 的精神—他們將驅力視為具有小寫 d。Ghent 的動機想法歸功於 Edelman (1987)，他認為人類經驗始於非常簡單、沒有反思的原始行為（例如轉向光明和溫暖），逐漸變得充滿了 Edelman 所說的價值。在迅速變得複雜的發展級聯中，小的、微妙的經驗（不是有意識的意圖）逐漸形成精心設計的動機系統。性、攻擊和安全是結果，而不是預設的發展動力。根據 Edelman 的觀點，衝突是新興的，而不是在潛意識的層面預先安排好的。Ghent 和 Harris 透過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或混沌理論的觀點來思考衝突，衝突是非常具有煽動力的引發改變者。在混沌理論中，存在著一種轉化理論。不平衡源於衝突。衝突是改變、運動和理解的源泉。為了成長或轉化，衝突有不同的形式。即使在潛意識的層面上，存在的方式之間或關聯的方式之間的衝突，也可能導致模式和談判經驗的不穩定。但是在分析工作中有某些時候，也許是心智表徵的或客體關係中的，自相矛盾的衝突牢固地存在著—衝突可能就在混沌的邊緣徘徊。這可能是與正在經歷哀悼和客體失落的患者一起工作時最為明顯的。

三、G. 法國拉岡學派的觀點

為了探討 Lacan 作品中的衝突的角色，在 Lacan 的寫作和教學中沒有特定適用的術語，David Lichtenstein (Christian, Eagle & Wolitzky, 2017; pp. 177-194) 相對地探索了主體的分裂的概念和分裂的結構，如同 Lacan 所理解的。在這過程中，他闡述了 Lacan 作品中的內容，其源於精神內在衝突的古典觀念以及背離古典觀念的觀點。

Lacan 分裂主體理論的一個基本概念是缺乏。法語中的單詞 *manqué* 既傳達了「失落」，也傳達了「缺乏」，也傳達了「空虛」和「空洞」。Lacan 認為遭遇到精神上的失落對於人類主體的形成至關重要。實際上，這樣的主體是藉由面對和再現失落而產生，沒有它，主體的形成就不會發生。這在 Lacan 的主體理論中至關重要。它根植於佛洛伊德關於原初潛抑的觀點，如〈享樂原則之外〉(Freud, 1920) 所表達的那樣，並認為這一過程對於主體性本身的形成至關重要。佛洛伊德所指的「滿足的原初經驗」是一個神話般的起源點，因為它沒有任何表徵，因此在它失去之前就無法在精神中形成經驗。努力尋回這失去的時刻，是一種主體性的定義原則。它植根於人的表徵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這種人類特有的功能核心是缺乏的原則，即失去滿足的。Lacan 的思想中，存在著與佛洛伊德相關的辯證關係：對失去滿足的原初潛抑，只有在表徵被潛抑才會出現，但是這些已經失去的只會有一種表徵存在，即潛抑和表徵必須一起出現：失落的客體已經失去了才存在。

Lacan 將失落置於主體存在之核心位置的其中一個後果是，它顛覆了嬰兒作為一種生活在文化之外的自然生物的所有想法。本能的嬰兒表現出先天的行為模式（包括依附模式）的觀點，和 Lacan 認為主體從其存在開始就被銘刻在文化中的觀念完全不同。精神分析中的衝突理論，通常關注於快樂與不快樂的經驗，以及解決兩者之間衝突的努力。這必然意味著「願望」、動機、意圖或慾望的理論。最後一個詞彙，慾望，甚至是慾望與願望之間的概念關係，在 Lacan 思想中發揮著重要角色，並揭示了該思想中精神內在衝突的內隱功能。

法語單詞 *désir* 是德語 *Wunsch* 的充分翻譯，佛洛伊德一般使用這個詞，並用英語翻譯為 *wish* 願望。然而，*désir* 也呈現在德語 *Begierde* (*Begehren*)，這個詞通常出現在黑格爾的文本中，比 *Wunsch* 更複雜，並且超出了願望的強度，即激情、貪婪或慾望。佛洛伊德的 *Wunsch* 和黑格爾的 *Begierde* 都被 Lacan 的 *désir* 所描述，兩者都可以用英語表示慾望，但不能用英語單詞 *wish* 來表示。在考慮對比詞的願望和慾望時，我們會遇到關於潛意識幻想和潛意識本身的功能的差異。Brenner 的觀點是，原始願望的本質是現實的，只在以更強大的願望來離開衝突時，才會變成被潛抑的幻想，即避免不贊同等等，這與 Lacan 認為慾望起初是潛意識幻想的想法完全不同：潛意識幻想可能透過各種謹慎的願望來傳達。

分裂的主體向分析師請求幫助，他／她要求幫助以減少痛苦或不愉悅的經驗。然而，分析的進行要提出這些請求可能另有所指。若不這麼做，而將力氣用在即刻減少不愉悅，則會棄絕分析的可能性。不可避免的推論是，這請求幫助裡含有其他的願望，或許有個願望是指向全知的分析師的概念，以及全知的分析師將會贈予的禮物（例如：在移情裡）。這另外的願望反映出（意識上的）請求以及（潛意識的）慾望之間的分歧。所有的臨床精神分析工作都發生在這分歧的軸線上。在法文裡，一個要求的說法是 *une demande*。因此精神分析主體的這個分歧，常常在拉岡學派思想的英語翻譯中得到處理，即是介於需求與慾望之間。

需求與慾望之間的分別，近似於一般常見的所謂顯內容與隱內容之間的分別，但並非完全等同。對 Lacan 而言，要求所顯現的內容不比它的邏輯重要。需求裡的邏輯是對缺乏有一個想像中的解答：「若我可以擁有我所要的，我就可以完整。」因為這願望帶有想像中的整體性，它在形式上是自戀的。它假定想像的傷害會得到想像中的修復。這就是為什麼成功的分析是令人挫折的。阻撓了得到一個想像中的解答的需求，分析師將治療導向表達缺乏的新隱喻，也是慾望的全新表述。Hans Loewald (1960) 提出分析裡的新客體概念，或許以及自我心理學常見關於新的妥協形成的創造概念，都與這個觀點有共鳴。拉岡學派的觀點中，這個新的可能性所倚仗的是慾望與需求兩者間本質上的差異，慾望的結構是一種對不可避免的缺乏的持續進行象徵性表達，需求的結構則是一種相信完整性、整合、或癒合是缺乏的解決方法。雖然這兩種意圖有不同的結構與邏輯，但是遇到一個純粹的慾望表達是不可能的，慾望它既被表達也被隱藏在需求裡。

慾望從來不以單純陳述的形式出現。一個幫助、建議、情感、支持、愛的請求必將是一種媒介，藉以傳達在潛意識慾望的層面中，超出那請求的某些東西。那種慾望出現的場合，總是發生在此時此地，以人際間的請求（需求）的方式表達。因此，如果想像慾望和需求之衝突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是一種辯證的衝突，唯有兩者一起才能找到新意。分析師的角色不是去癒合或是縫合這分歧，而是傾聽它，讓被分析者覺察它，並且指出不論是出於什麼症狀的僵局使被分析者請求分析，就可以在那裡找到路。這就像 Hans Loewald 提到的「意識與潛意識上，在精神活動模式與慾望之間，有意識地挪用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溝通」（1978, p. 50-51）。連結 Loewald 與 Lacan 觀點的關鍵片語是精神活動模式。不是以內容來區分慾望和需求，也不是原我和自我，而是它被再現的模式。

要傾聽需求的表象後面所表達的慾望，是指分析師不必完全聚焦在理解上，而是要傾聽與顯現意義同行的表達方式（精神活動模式）。從慾望與需求之間的辯證來看傾聽的進程，而不是較為傳統的精神分析範疇如驅力衍生物以及防衛，這樣做有什麼好處仍然是個問題。拉岡學派要標示出慾望的表達、用各種方式打斷被分析者的對話，以指出有什麼言外之意，這對特定分析師傾聽以及介入的方式非常敏感。根據這些概念，在臨床技術上，言談中慾望的表達總是伴隨著使用譬喻去取代或顛覆原先預期的含義，而這些替換和顛覆透過語言的結構得以實現。要傾聽慾望表達的關鍵並不是去詮釋對立於自我的原我，而是去傾聽話語的風格特徵，因為這可能可以喚起意義的多重決定角色，這更能指引分析師如何促使想像界的確定性被顛覆。所有解釋性的介入，不論那是打算要說明防衛或是驅力衍生物，都會冒著風險：使對話擱淺在主體的認同和物化的確定性裡，因此阻礙了意義的演示，那也是慾望的招牌特徵。

三、H. 非拉岡學派法國作者

Jean Laplanche (2004) 提出了精神衝突的理論，是以他的潛意識與驅力理論為基礎，主要在探討和成人他者的原始關係，即神秘的（潛意識的性）訊息的發送者。

從愛與恨的對立這核心出發，Laplanche 提出在性的潛意識層次，有未結合的（情慾的）性慾與結合的（自戀的與／或客體關聯的）性慾之間的對立存在，兩者都是在潛意識幻想的層次上。兩者都和自我保存的前精神層次有辯證的關係，表示有某種心理—生理的「線路」先存在，特點是有天然的溫情以及攻擊性。在人類嬰兒，這「線

路」立即就被他者的神祕訊息入侵。在自我保存運作之層次上可以放置溫情（佛洛伊德的措詞）或依附。第二個層次是情慾之層次，其描述追溯自性學三論。最後，第三個層次是全部客體的愛之層次、是愛慾的愛，同時是自戀的也是客體關聯的 (Laplanche 2004, p. 468)。成人的訊息不會保持在單一的、一致的層次—照顧和溫情的層次。在親密身體接觸的情況下，父母的性幻想喚醒也迫使或影射進入自我保存關係的中心。這些訊息是「妥協的」（以這個詞的精神分析含意來說）也因此對發送者自己來說是潛意識的。試圖要掌握這些神祕訊息的孩子，透過他可用的密碼來重新得到這些。在這層意義上，所謂的死亡驅力，實際上是我們在潛意識的最深層所偵測到的他者性的「純文化」。在最難以到達的原我層次裡當然也是這樣。然而很快的，透過自我的活動以及文化環境的幫助，片斷的場景、一系列幻想的片段出現了，這些都將逐漸被偉大的組織力量，也就是伊底帕斯與閹割情結所吸收。

比起其他力量，精神裡的結合力量並不亞於性。儘管如此，作為力量的源頭，它們總是把其力量來源作為某種整體：人類作為單一個體的整體；自我與其型式與意念的整體。

因此，在生命與死亡驅力的宏偉對峙中，是結合與未結合的對峙，在精神裝置的內部工作。新生的孩子努力翻譯成人誘惑且神祕的訊息，不讓未結合的刺激變得過度巨大。從那時起，結合是為了對峙內在的他者（潛意識及其分支）所發動的戰爭 (Laplanche 2004)。

André Green (1975, 1998) 概念化了「死亡母親」、「負的工作」、「分析的客體」、客體與驅力之間動力的互聯性、精神內在的與互為主體的、表徵與情感之間的「拮抗式合作」，這些不僅是紮根於局部的精神衝突，或更是整體的衝突狀態。

Green 在構想負的工作的概念中，提出將這些防衛機轉，如潛抑 (repression)、分裂 (splitting)、拒認 (disavowal)、棄絕 (foreclosure) 或是拒絕 (rejection) 和否定 (negation) 集合在一起，因為他將它們全部都看做是原型潛抑的詳細闡述。在他的觀點，它們全部都必然包含了一種評斷、接受或是拒絕：一個答覆是好與／或不好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基於不同的脈絡，涉及各種不同的素材（本能的衝動、情感、表徵、知覺、詞語、諸如此類）。在各種不同的防衛機轉當中，由於這群的組成要素，直接地包含這些根植於潛意識或原我的意識衍生物的基本選擇的接受或拒絕，而使得這群防衛組合有異於其他的組合。

在描寫邊緣性精神病人中，Green 提到兩種機轉會導致精神的盲目：身體式的排除，是指經由退行把衝突從精神範疇分離至身體，再透過行動—這個心理運動層面中精神範疇的對應，將之（衝突）驅逐。此外，分裂以及撤除灌注展現了邊緣性病人在妄想或（精神過程的）死亡的兩難。這裡，重視溝通的微妙之處，以分析師的部分來說，在不侵擾的在場與缺席之間，取得最佳平衡是必要的，這樣讓潛在的象徵化和表徵化的進程得以浮現。

Piera Aulagnier 在她的童年精神病理論中，描繪並展開了佛洛伊德、Winnicott、以及 Lacan 的想法，她發現有三個層次的表徵：原始象形圖示、初級歷程幻想、次級歷程意念。初級歷程被活化來象徵及再現，來辨識另一個軀體出現與缺席的存在。在這

個功能上，這和只承認唯一一個精神空間的原始歷程（象形圖示，為其本身藉由其本身創造）有衝突。初級歷程幻想的功能，便是去解決這個衝突 (2001, p.40-42)。

Joyce McDougall (1980) 在她對「行動 Agieren」的研究中指出英文翻譯「行動化 acting out」準確地反映了一種經濟次序的雙重概念：首先有某些東西被放到（本身或分析情境的）外面，在心理上這原本應該要被留在裡面並且被處理；接著，張力被排出或流失，以至於沒有任何內部衝突留下。焦慮或憂鬱的情感被保留在意識之外，否則這會使個體的處理能力難以承受。在 McDougall 的理論中，有一種「除權棄絕 foreclosure」的機轉，近似於佛洛伊德學派「心靈的駁斥 repudiation from the psyche」（不同於潛抑或否認）在調解張力的行動化與釋放的經濟動作。

在她對身心症現象的探索中，McDougall 描述精神衝突被拒認，並且被丟出精神之外，藉由身體以及身體的功能來釋放。她推論在精神生活的開端，身體被經驗為屬於外在世界的客體。這種知覺的狀態持續存在於夢境生活之中，以及某些精神病狀態之中，在其中整個身體或是「身體的某些區域或是功能被當作是獨立的實體，就像是屬於或是由另一個人所控制」（McDougall 1980, p. 419）。

四、拉丁美洲的概念用法

在拉丁美洲，對於精神衝突後果的研究領域有許多豐富的貢獻，不論是在精神裝置的構成、臨床表現、以及技術的理論，都表現出創造性的綜述，這些融合了佛洛伊德、Klein、Bion、以及非拉岡學派法國作者們，特別是 Laplanche、Green、Aulagnier、以及 McDougall。

雖然在 Pichon Riviere 的知覺操作參考系統 (ECRO)、Racker 的一致與互補的反移情理論、以及 Lieberman 的溝通的理論 (Borensztein 2014) 也可以看到衝突的概念，關於拉丁美洲作者們對衝突的觀點，最適宜的範例，或許可以在 Angel Garma、Arnaldo Rascovsky、Maurice Abadi、以及 Norberto Carlos Marucco 的貢獻裡闡明。

四、A. Ángel Garma

對 Ángel Garma 來說，主要的衝突發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間；他遵循佛洛伊德在〈自我與原我〉文章中，精神官能症的嚴重程度和超我的嚴厲程度成正比的概念。此外，如果睡眠是由每次自我和超我交涉後所構成的模型，那麼對製造的形式之概念的修改，必然會對症狀學的表徵遺傳學理論的機制產生影響。

從結構理論的觀點來看，Garma 重新繪製了夢的「構形」模式。在睡眠的情境中，因自我退行而使得審查機制鬆懈，這些審查機制在白天的生活中將本我的內容維持在潛意識中，但在睡夢中因禁制較少而得以被表達。這導致了一種等同於創傷的情況：具有象徵缺陷的自我，面臨著蘊藏高度能量的（被灌注的）和令人痛苦的內容，例如原初場景、被閹割的痛苦、弑親等等。面對這樣的事態，做夢者的自我只能掩蓋它，並求助於防衛機制。像滿足慾望就是其中一種變形模式 (1978, pp. 71-78)。因此，每個夢最後都會變成是一個「蒙面的惡夢」(in: Rashovsky de Salvarezza 1974, p. 142)。之前，Garma 回顧並推翻佛洛伊德一些關於夢和幻覺過程的概念，和創傷及現實檢核

有關 (Garma, 1946, 1966, 1969)，他的結論是：「必須清楚的了解，患有創傷精神官能症的人會產生幻覺，因為他既無法藉由肌肉的神經支配或自我對於創傷相關的心理內容的反灌注，來拒絕或控制這些幻覺，也就是創傷的內部記憶，這些記憶會在創傷發生後的幾天內自發地產生。而這些內容的運作會是密集地進行一段時間，且不能避免，因此使得他產生幻覺，經歷當下時刻就像是現實外在正在發生的事件，而非僅僅是記憶而已」 (Garma, 1969, pp. 488-489)。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是「夢是睡眠時的幻覺，是由迄今為止因睡眠的自我無法控制而潛抑的精神內容，對睡眠者被削弱自我的創傷性影響所產生，因此睡眠的自我當作真實地接受且被迫偽裝，以尋求減緩痛苦的精神張力」 (同上, p. 491)。

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夢理論，也需要從結構理論的角度來闡述創傷的後設心理學：「〔...〕受創的精神被認為可以分成幾種情況：一種是寄生的情況，由強烈創傷所引發的強迫重複，另一種情況是自體順服於被要求要重複的，還有一種情況是健康和健全的自我...要保護自己...免於強迫重複並試圖管理這些出於本能的力量」 (1978, p. 116)。後來，這個「寄生的情況」被稱為超我 (1978, p. 118)。通過這種方式，「精神官能症受到有害的超我的限制，超我反映了有害的外在現實，讓自我臣服，迫使它表現得不恰當，並阻止它以和諧的方式管理本我。」 (1978, pp. 118-119)。

在 Garma 的理論中，強調任何的精神官能症症狀（在個人的層次和團體的層次）是強迫重複的力量和導致「掩飾」的力量的組合與衝突的互動，如同佛洛伊德 (1939) 在〈摩西和一神論〉中所陳述的。

在這個背景下，Garma 也重新定義與受虐狂的衝突概念相關的生與死的驅力概念，在他看來，生與死的驅力不是基本的力量，而是在精神的建構過程中，遭遇到的經驗與內化經驗的結果。當談到國家時，Garma 跟隨佛洛伊德的詮釋方式，將其類比到精神官能症個體，他發展愛慾和死亡驅力概念：「從持續存在於現在反應中的過去經驗反應，有些會推動一個國家朝向進步、幸福，但另一方面，有些是較有破壞性的並造成痛苦的，所以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可以這麼描述，簡單來說，在一個國家裡，有進步的、富有生命力的傾向或衝動的民族，以及其他具有退化的、自我破壞的或死亡傾向的民族」 (1978, p. 47)。Garma 在其他地方繼續相同主題，他說：「...〔這些〕是基於將病態行為（...）視為對內化的迫害客體一種屈服或攻擊的連續性，（...）這些主要是針對性器特質。反過來，這些內化的迫害客體來自於對當前的、孩子般的、世襲的情況的屈服，這些情況是有害的，而且一直是有害的」 (in: Raskovsky de Salvarezza (1974, p. 169)。

將超我概念化為一組迫害性客體，對抗主體的生殖力，並考量伊底帕斯衝突的核心地位，進一步將死亡本能視為是個體內化了破壞性經驗的結果，超我可說是死亡本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對 Garma 來說，受虐是精神官能症產生的基本元素。

四、B. Arnaldo Rascovsky

Arnaldo Rascovsky 進一步延伸這個概念，當他在有弑子傾向父母的研究對象領域，找出病態行為起源。因此，他對病態心理的理解，源於對弑子者的理解，例如「（...）用不同項目來干擾小孩身心整合的父母的所有行動，我們綜合出以下幾個大類：謀殺、殘害、詆毀、虐待、忽視和遺棄」 (1974, p. 316)。這種弑子行動會在自我

對超我的關係中延續下去。殺親傾向是次發於弑子傾向，並且前者是遵循對攻擊者的認同機制 (1974, p. 314)。Rascovsky 追溯各種民族的神話和聖經中對於弑子者的表達，最後他認為這是一神論觀念和社會文化過程的基礎 (1981)。(譯註：古希臘神話的巨人族會吞噬自己的孩子)

四、C. Mauricio Abadi

Mauricio Abadi 在他的著作《Renacimiento de Edipo》(1977) 中，基於對古代希臘詩人 Sophocles 的「伊底帕斯王」的新解釋，重新閱讀了伊底帕斯情結，由於有了這樣一個新的核心情結的概念，因此牽涉在衝突之中的元素，不僅僅是經典的那些而已。對 Abadi 來說，所有行為的動機都是來自於死亡的痛苦。另一方面，任何要去詮釋主體表象的嘗試，都只能以三元動力來理解。佛洛伊德式的伊底帕斯概念中，裡面的父親、母親和兒子的這些人物們，被角色所取代，同樣的，這些角色可以同時或先後地被任何真實人物形象所替代。這些角色如下：持有的、提取的和孝順的角色。如果根本的痛苦是死亡的話，無論是對於父親還是母親，為了確保生存，試想看看，應該就是擁有孩子吧。這樣來看，對於兩性而言，對於永恆懷孕的幻想都是通用的。父權組織，他們隱瞞了關於男性嫉羨伴隨著女性可能懷孕的這件事情。這是源自於習俗「擬娩」，在幾種原始文化中有很好的記載，即將成為爸爸的男性在他的妻子分娩的時候，模仿分娩的動作。

Abadi 選擇的模型，用來解釋伴隨著這個驗證法的三種特定角色，和特定焦慮之間的關聯性，就是分娩的模型，包括三個時刻：懷孕，通過產道和子宮外的生活。衝突沿著兩個軸向發展：兩性之間的爭鬥以及父母與孩子的爭鬥。父親和母親互相搶著要佔有兒子，兒子在這對峙之中是賭注。這種爭鬥是由兩種情感所驅使的：愛的情感，意即追求完整感；另一種則是尋求反對和排斥的仇恨感。另一方面，兒子試圖從一方父母那裡解脫出來，為此他必須與另一方建立聯盟；對父母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性慾是一種載具，藉此，聯盟-雙方的連結鍵-就會被建立起來。持有的角色忙著去接管兒子（永恆懷孕），而提取的角色則忙著與兒子建立聯盟以釋放他，或者反過來說，是要佔有他。兩性的爭鬥以這樣的方式獲得了分離感：「為了讓我活著，你必須死。」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的特點，是父親對自己不孕的痛苦，以及由此引起想要偷走兒子的渴望。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則是一種聯繫，在這種關係中，母親企圖生育並保留她的產物，並把父親剔除在外。

兒子試圖擺脫母親對他的禁錮，母親對此加以譴責，因為被維持在此種封閉，因而導致死亡的痛苦。逃避母親的監牢相當於弑母，並且承擔了出生的罪惡感，與此相關地，還有迫害性的痛苦，產生於面對一個總是在吞噬的母親的幻想，或是一個嘗試將她的產物或孩子送回子宮的母親的幻想。對於兒子來說，母親試圖將他保持在共生關係之中，而父親是共生的解放者；父親也是一個指導和模範，將自己保持在外。然而，兒子與父親的關係是矛盾的，因為隨著解放他的兒子，他也會想要以併吞作為抵銷死亡痛苦的神奇方法。反過來說，面對原初場景的孩子，他會經歷到被排斥的感覺，並試圖通過同盟的策略來去解散他們，這樣他就可以從其中一方或是從父母雙方之中獨立出來。每個角色都是矛盾的，因為每個行動都在內外的辯證中展開，這其中，在每個位置上來看都乘載著特定的痛苦：在內部有安全感，有依賴，是一座監獄，而外部則有著自由，但也有無助和遺棄。因此，兒子和父母的行為是既愛又恨

的，因為這齣戲中的每個主角都在奮鬥，同時一邊努力保持或回到內部，一邊避免被一個囚禁的內在威脅自己而被封閉，在此辯證的每一個動作中，都有伴隨著死亡的風險。

四、D. Norberto Carlos Marucco

Norberto Carlos Marucco 在提到「辯證法」而不是「衝突」的時候，他是奠基於 Freud、Klein、Bion、Winnicott、Lacan、Laplanche 和 Green 等人的基礎之上的。根據他對邊緣性病患的臨床經驗，Marucco（1997）根據性驅力與客體狀態之間的辯證關係，對性特質和表徵的精神分析理論進行了修正。這個作者提出了一種分裂的精神結構的概念，即拆分為否認閹割與創造虛擬客體（非病態的戀物癖），其中客體選擇和愛的條件都是基於後者。在作者看來，分析治療的目的是在承認閹割和保存驅力的拒絕之間達到一種創造性的平衡，這種辯證法也是昇華理論的基礎。虛擬客體必須在分析的關係之中被培養和使用隱喻再現才行。在性特質和移情的背景脈絡下，驅力和客體的辯證也必須被納入討論之中。為了避免對客體理想化的危險，作者主張，必須允許伊底帕斯式的性慾在情慾移情中展開來，而分析師有時會替代前伊底帕斯客體。

五、結論

由於佛洛伊德的創造力和洞察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改變了自己的衝突理論。在他去世後，多樣性和爭議愈演愈烈，例如英國戰爭時期 Anna Freud 和 Melanie Klein 的追隨者之間的論戰。複雜的後佛洛伊德學派的歐陸精神分析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國的情況 – 帶著他們的佛洛伊德學派、克萊恩學派和獨立學派的傳統，以及他們各自對衝突的中心地位的看法，混合了影響力漸增的法國觀點。

隨著逃離納粹後，越來越多優秀的歐洲分析師加入，特別是那些與佛洛伊德和安娜佛洛伊德關係密切的分析師，使得後佛洛伊德學派的北美精神分析，首先在自我心理學的範疇內系統化，其強調了系統間和系統內部的結構性衝突。到了 70 年代，隨著 Heinz Hartmann 的死，「Hartmann 時代」悄然成為歷史，理論和實踐中的多元化時代來臨了。

橫跨各大洲，Klein、Bion 和 Winnicott 的英國客體關係理論的影響越來越大；法國拉岡學派和非拉岡學派的觀點、在拉丁美洲作者們的作品綜合了佛洛伊德和上述所有觀點、以及 Kohut 的自體心理學、關係和互為主體觀點的出現，連同嬰兒研究的興起和現代神經科學的進步，皆與精神分析臨床實踐的「擴大範圍」不謀而合，豐富了精神分析對於衝突的不同方向的想法。

早期對於伊底帕斯衝突的關注，轉為對（前伊底帕斯）衝突的新構想，這個新構想涉及了，被內化的二元客體關係、分離焦慮、客體的失去、失去客體的愛、失去身份和失去現實中，在發展上最早的的認同-投射和內攝歷程，這與通過表徵和象徵化建立精神結構的最早階段有關。關於創傷相對於潛意識衝突的重要性的舊有爭議（和衝突），以及幻想（潛意識幻想）相對於現實、生理及體質的特性相對於環境、衝突相對於缺陷，這些兩極分化都被重新審視，並且只能逐漸被整合到一個複雜的「互補系列」典範的當代版本。新典範的典型包括是在最近的後佛洛伊德學派的、後克萊恩學

派的、後比昂學派的模型之間一些匯集的潮流，如同是試圖整合前伊底帕斯和伊底帕斯階段，關於衝突和神經生物學發展的組織的一些綜合模型。

當代對於與衝突有關的理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的更多正面評價，有益於精神分析的思考與實務操作。現代的神經科學，確立了我們心智活動絕大多數是潛意識的，且心智生活是富涵衝突的。儘管有相反的可怕的預想，精神分析持續於提供對於人類心智，伴隨其本質（顯意或隱意的知曉、中心位置或背景）的衝突，最深的理解。

參考文獻

Abadi, M (1977): Renacimiento de Edipo, Buenos Aires:Trieb.

Abend S. M. (2005). Analyzing Intrapsychic Conflict. Compromise Formation as an Operating Organizing Principle. *Psychoanal Q* 74: 5-25.

Abend, SM (2007). Therapeutic Action in Modern Conflict Theory. *Psychoanalytic Q.* 76S: 1417-1442.

Akhtar, S (2009).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Apprey, M. (2015), The Pluperfect Errand: A Turbulent return to beginnings in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structive Aggression. *Free Associations: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 Media, Groups, Politics*, 77: 15-28.

Arlow, J.A. (1963). Conflict, Regression, and Symptom Formation. *Int J Psychoanal* 44:12- 22.

Arlow, J.A. (1969). Fantasy, Memory, and Reality Testing. *Psychoanal. Q.*, 38:28-51.

Arlow, J., Brenner C. (1964)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and the structural theo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Arlow, J.A. (1982). Problems of the Superego Concept. *Psychoanal. St. Child*, 37:229-244.

Arlow, J. (1980). Object concept and object choice. *Psychoanal. Q.* 1980; 49:109-

Arlow, J.A. (1987). The Dynamics of Interpretation. *Psychoanal. Q.*, 56:68-87

Arlow, J. (1991). *Clin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Aron, L. (1996). *A Meeting of Minds: Mutuality in Psychoanalysis*.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Auchincloss, E. and Samberg, E., Eds. (2012). *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ulagnier, P. (2001). *The Violence of Interpretation: From Pictogram to Statement*. Philadelphia: Brunner-Routledge.

Balint, Michael (1968). (1968). *Therapeutische Aspekte der Regression. Die Theorie der Grundstörung*. Reinbek, Hamburg. Rowohlt (studium 42), 1973

Baranger, W. (2009a), *The dead-alive: object structure in mourning and depressive states*. In Baranger, W. and Baranger, M. (2009): *The Work of Confluence; Listening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Psychoanalytic Field*. Pp.203-216. London Karnac

Baranger, W. (2009b) *Spiral Process and the dynamic field*. In Baranger and Baranger (2009), op.cit., pp. 45-62.

Baranger W. and Baranger, M. (2006), *The Analytic situation as a dynamic field*. *Int. J. Psychoanal.* 89:795-826.

Benjamin, J. (1995). *Like Subjects, Love Objec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Benjamin, J. (1998). *The Shadow of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Bion, W. R. (1955). *Language and the Schizophrenic*. In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1955, pp. 220-239).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Bion, W. R. (1957).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 personalities*. In, *Second Thoughts* (1967, pp. 43-64).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 R.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 *Second Thoughts* (1967, pp. 93-109).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 R. (1962a). *A theory of thinking*. In *Second Thoughts* (1967, pp. 110-119).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 R. (1962b).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 R. (1963). *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 R. (1965).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ion, W.R. (1965). *Transformations: Change from Learning to Growth*. London: Tavistock.

Bion, W. R. (1970).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lanck, G. (1966). *Some Technical Implications of Ego Psychology*. *Int. J. Psycho-Anal.*, 47:6-13.

Blanck, G., Blanck, R. (1972). Toward a Psychoanalytic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0:668-710.

Blum HP., ed. (1985). Defense and resist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urrent concep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85.

Blum HP, ed. (1990). Fantasy, myth and reality. 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Arlow, M.D.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Blum, HP (1998). Ego 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tructural Theory. IPA Newsletter. 2: 31-35.

Bohleber, Werner (2000). Die Entwicklung der Traumatheorie in der Psychoanalyse. Psyche, 54, 9-10, 797-839.

Borensztejn, C. editor (2014). Diccionario de Psicoanálisis Argentino, Buenos Aires: Asociacion Psicoanalitica Argentina.

Brenner C. (1967). The mechanics of repression. In: Lowenstein RM. et al, eds. Essays in honor of H. Hartman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pp.:390-99.

Brenner C. (1979). Depressive affect, anxiety and psychic conflict in the phallic-oedipal phase Psychoanal. Q., 48: 177-99.

Brenner C. (1981). Defense and defense mechanisms. Psychoanal. Q. 50:557-69.

Brenner C. (1982). The concept of superego: a reformulation. Psychoanal. Q., 51:501-25

Brenner C. (1982). The Mind in Conflic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Brenner C. (1991).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depression. J.Amer. Psychoanal. Assn. 39:25-44.

Brenner, C. (2002). Conflict, Compromise 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Theory. Psychoanal Q 71: 397-417

Breuer, J and Freud, S (1893a [1892]). On the psych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SE 2, 1-18.

Bromberg, P. (1998). Standing in the Spaces.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Busch, F. (2005). Conflict Theory / Trauma Theory. Psychoanal Q 74:27- 45.

Canestri, J. (2005).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use and Meaning of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 Q 74:295-326.

Christian, C., Eagle, M.N., and Wolitzky, D.L. (Eds.) (2017).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Corbett, K. (2001a). More life: centrality and marginal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Psychoanal. Dial.*, 11: 313-335.

Corbett, K. (2001b). Nontraditional family romance. *Psychoanal. Q.*, 70: 599-624. Davies, J. M. (1998).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multiplicity. *Psychoanal. Dial.*, 8: 195-206.

Davies, J. M. (2001). Back to the future in psychoanalysis: trauma, dissociation, and 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 processes. In *Storms in Her Head: Freu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ysteria*, ed. M. Dimen & A. Harris. New York: Other Press, pp. 245-264.

Dimen, M. (2003). *Sexuality, Intimacy, Power*.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Dorpat, T.L. (1976). Structural Conflict and Object Relations Conflict.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4:855-874.

Druck, A.B., Ellman, C., Freedman, N., & Thaler, A. (editors) (2011). *A New Freudian Synthesis: Clinical Process in Next Gene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Karnac.

Edelman, G. (1987). *Neural Darwinism: The Theory of Neural Group Sele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Eissler, K.R. (1987). Ein Abschied von Freuds »Traumdeutung«. *Psyche – Z Psychoanal.*, 41: 969-986.

Ellman C., Grand S., Silvan M., and Ellman S (1998). *The Modern Freudia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Northvale, NJ: Aronson.

Erikson, E. (1956).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Am.Psychoanal.Assoc.*, 4:56-121.

Fairbairn, W.R.D. (1954). *An Object–Relations theory of the Person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Freud, A. (1936). *The Ego and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Freud, S.; Breuer, J. (1895). *Studies on Hysteria*. SE 2: pp. 1-323.

Freud, S. (1894a).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An Attempt at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Acquired Hysteria, of Many Phobias and Obsessions¹ and of Certain Hallucinatory Psychoses. SE 3, pp..41-61.

Freud, S. (1894b) *Obsessions and Phobias: Their Psychical Mechanism and their Aetiology*. SE 3, pp. 69-82.

Freud, S. (1894c). On the Grounds for Detaching a Particular Syndrome From Neurasthenia Under The Description 'Anxiety Neurosis'. SE 3, pp. 85-115.

Freud, Sigmund (1985). Brief an Wilhelm Fließ 1887–1904.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v-492.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eud, S. (1897). Extracts from the Fliess papers. SE 1, pp. 173-280. Freud, Sigmund (1896). The Aetiology of Hysteria. SE 3, pp. 187-221.

Freud, S. (1898). Sexuality in the Aetiology of the Neuroses. In: Early Psycho-Analytic Publications (1893-1899). SE 3. 259-285.

Freud, S. (1899). Letter 105 from Extracts from the Fliess Papers. (1886-1899): Pre-PsychoAnalytic Publications and Unpublished Drafts. SE 1. 278-279.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E 4 & 5. Freud, S. (1905a).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SE 7, 1-122.

Freud, S. (1905b).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SE 7.: 123-246.

Freud, S. (1909a). Notes 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SE 10, 152-318.

Freud, S. (1909b). Analysis of a Phobia on a Five-Year-Old Boy. SE 10, 1-150.

Freud, S. (1910a) The Psychoanalytic View of Psychogenic Disturbance of Vision, SE 11.

Freud, S.(1910b).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SE 11, 57-138

Freud, S. (1911a). 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SE 12, pp. 214-226.

Freud, S. (1911b).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SE 12, 1-82.

Freud, S. (1912). 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Practising Psycho-Analysis. The SE 12, pp. 109-120.

Freud, S. (1912-13). Totem and Taboo. SE 13, pp. 1-162.

Freud, S. (1914).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SE 14. Freud, S. (1915a).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SE 14, 117-140.

Freud, S. (1915b). Repression. SE 14, 146-158. Freud, S. (1915c). The Unconscious. SE 14, 166-204.

Freud, S. (1916-1917).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16, 241-463.

Freud, S. (191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SE 14, pp. 237-258.

- Freud, S. (1918).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E 17, 1-124.
-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E 18, pp. 1-64.
- Freud, S.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SE 18, 65-144
- Freud, S. (1923a). The Ego and the Id. SE 19. (pp. 3-66).
- Freud, S. (1923b).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An Interpolation into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SE 24, 139-146.
- Freud, S. (1924a). The Loss of Reality in Neurosis and Psychosis. SE 19, 147-154.
- Freud, Sigmund (1924b).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SE 19, 171-180.
- Freud, Sigmund (1925).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SE 20, 1-74.
- Freud, S. (1926).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SE 20
- Freud, S. (1937a).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E 23, pp. 209-254.
- Freud, S. (1937b). 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SE 23, 255-270.
- Freud, S. (1939). Moses and Monotheism. SE 23, 1-138.
- Freud, S (194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E 23, 139-208.
- Fürstenau, P (1977). Die beiden Dimensionen des psychoanalytischen Umgangs mit strukturell ich-gestörten Patienten. *Psyche*, 31: 197-207.
- Garma, Á. 1946 The genesis of reality testing. *Psychoanal. Q.* 15:161-174
- Garma, A. (1966). *The Psychoanalysis of Dreams*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 Garma, A. (1969). Present Thoughts on Freud's Theory of Dream Hallucination. *Int. J. PsychoAnal.*, 50:485-494.
- Garma, A. (1978): *El Psicoanálisis, teoría, clínica y técnica*. Buenos Aires, Paidós.
- Gedo, J. E. & Goldberg, A. (1973). *Models of the Mind*.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hent, E. (2002). Wish, need, drive: motive in the light of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nd Edelman's selectionist theory. *Psychoanal. Dial.*, 12: 763-808.
- Goethe, J W (1795/96).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8 Bücher. 2. Band.
<http://gutenberg.spiegel.de/buch/wilhelm-meisters-lehrjahre-3669/34> [20.8.2015]

Goldberg, P. (2008), Catastrophic change, communal dreaming and the counter-catastrophic personality. Paper, 4th EBOR Conference, Seattle, WA Nov 1, 2008.

Goldner, V. (2003). Ironic gender/authentic sex. *Stud. Gend. Sex.*, 4: 113-139.

Gray, P. (1994). *The Ego and the Analysis of Defense*. Northvale, NJ: Aronson.

Green, A. (1975). The Analyst, Symbolization and Absence in the Analytic Setting (On Changes in Analytic Practice and Analytic Experience) - In Memory of D. W. Winnicott. *Int. J. Psycho-Anal.*, 56:1-22.

Green, A. (1998). The Primordial Mind and the Work of the Negative. *Int. J. Psycho-Anal.*, 79:649-665.

Greenberg, J. (1991). *Oedipus and Beyond: A Clin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Greenberg, J. & Mitchell, S. (1983). *Object Rel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ubrich-Simitis, I. (1987). Trauma oder Trieb – Trieb und Trauma. *Lektionen aus Sigmund Freuds phylogenetischer Phantasie von 1915. Psyche*, 41, 11, 992–1023.

Grubrich-Simitis, I. (1988). Trauma or Drive—drive and Trauma—A Reading of Sigmund Freud's Phylogenetic Fantasy of 1915. *Psychoanal. St. Child*, 43:3-32.

Grubrich-Simitis, I. (2000). Metamorphos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Freud's Conflicted Relations with his Book of the Century. *Int. J. Psycho-Anal.*, 81:155-1183.

Harris, A. (2005). Conflict in Relational Treatments. *Psychoanal Q* 74:267-293.

Harris, A. (2000). Trance and transference. Paper given at the Spring Meeting of Division 39 of the Amer. Psychol. Assn., San Francisco, CA.

Harris, A. (2005). *Gender as Soft Assembl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Hartmann, H. (1939).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Hartmann, H. (1950/1964). *Essays on Ego Psychology: Selected Problem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NY: Int. Univ. Press).

Hoffer, A. (1985). Toward a Definition of Psychoanalytic Neutralit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3:771-795.

- Hoffman, I. (1998). *Ritual and Spontane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A Dialectical Constructivist View*.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 Ingram, D.H. (Ed.) (1985) *Karen Horney: Final Lectur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Isaacs, S. (1952).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In: *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 (1952, pp. 67-121). London: Hogarth Press.
- Jacobson, E. (1964).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Joseph, B. (1989). *Psychic Equilibrium and Psychic Change: Selected Papers of Betty Joseph*. New York: Routledge.
- Kapfhammer, Hans-Peter (2012a). Trauma und Psychose – Teil 1. Zur Assoziation frühkindlicher Traumatisierungen bei psychotischen Patienten in klinischen Inanspruchnahmegruppen. *Neuropsychiatrie*. Springer-Verlag.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211-012-0030-x#page-1> [17.8.2015]
- Kapfhammer, Hans-Peter (2012b). Trauma und Psychose – Teil 2. Zur Assoziation frühkindlicher Traumatisierungen und Psychoserisiko in der Allgemeinbevölkerung. *Neuropsychiatrie*. Springer-Verlag.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211-012-0031-9#page-2> [17.8.2015]
- Kernberg, O.F. (1983). *Object Rel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Kernberg, O. (2004) *Psychoanalytic Object Relations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Controversie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Techniq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6-47.
- Kernberg O. (2005). Unconscious Conflict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Findings. *Psychoanal Q* 74:65-81
- Kernberg, O.F., Yeomans, F.E. and Clarkin, J.F., and Levy, K.N. (2008). 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 Overview and Update. *Int. J Psycho-Anal.* 89, 601-620.
- Kernberg, O. (2011). Divergent Contemporary Trend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Psychoanal Rev*, 98,5, 633-664.
- Kernberg, O. (2012a). Identity: Recent Finding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Inseparable Nature of Love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pp 3-30.
- Kernberg, O. (2012b). Mentalization, Mindfulness, Insight, Empath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Inseparable Nature of Love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pp 57-79.
- Kernberg, O. (2013). What is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ress).

Kernberg, O. (2014). The Unresolved Problem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ersönlichkeitsstörungen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ress).

Kernberg, O.F. (2015).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dynamic Development. *Int.Forum Psychoanal.*, 24:38-46.

Killingmo B. (1989). Conflict and Deficit: Implications for Technique. *Int J Psycho-Anal* 70:65-79.

Klein, M. (1928). 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25*, pp. (186-198, 1975). New York: Free Press

Klein, Melanie (1928). Frühstadien des Ödipuskonfliktes. *Gesammelte Schriften I/1*, 287–305

Klein, Melanie (1932). Die Psychoanalyse des Kindes. *Gesammelte Schriften II*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 *Developments In Psycho – Analysis*. Riviere, J. (ed). London: Hogarth Press, pp 292-320.

Klein, M. (1952). 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pp. (57-60, 1975). New York: Free Press.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Madison, CT: Int. Univ. Press

Kris, A. O. (1984). The Conflicts of Ambivalence *Psychoanal. Study Child*, 39:213-234.

Kris, A. O. (1985). Resistance in Convergent and in Divergent Conflicts *Psychoanal. Q.*, 54:537-568.

Kris, E. 1955: Neutralization and Sublimation, *Psychoanal.Study Child*, 10:30-46

Kris, E. 1950 On preconscious mental processes *Psychoanal. Q.* 19:540-560.

Kris, E. 1951 Ego psych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oanal. Q.* 20:15-30.

Lacan, J. (2006) *Ecrits* (B. Fink, Trans.). New York: Norton.

Laplanche, J. (2004). The So-Called 'Death Drive': A Sexual Drive¹. *Brit. J. Psychother.*, 20(4):455-471.

Laplanche, J. and Pontalis, J-B.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D. NicholsonSmith, Trans.), New York: Norton.

Layton, L. (1998). *Who's That Girl? Who's That Boy? Clinical Practice Meets Postmodernism*. Northvale, NJ: Aronson.

Loewald, H. (1960)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 41:16-33.

Loewald, H. (1978) *Psycho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dividual (Freud Lectures at Yale S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hler, M., Pine, F., and Bergman, A. (1975).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

Marucco, N. C. (1997). The Oedipus complex, castration and the fetish: A revision of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sexuality. *Int. J. Psycho-Anal.* 78: 351-55.

Masson, J.M. (1985).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Dougall, J. (1980). A Child is Being Eaten—I: Psychosomatic States, Anxiety Neurosis and Hysteria—a Theoretical Approach II: The Abysmal Mother and the Cork Child—a Clinical Illustration. *Contemp. Psychoanal.*, 16:417-459

Meltzer, D. (1966). The relation of anal masturbation to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47: 335-44.

Mitchell, S.A. (1995). Commentary on "Contemporary Structural Psychoanalysis and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 Psychol.*, 12:575-582

Mitchell, S. (1997). *Influence and Autonomy in Psychoanalysis*.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itchell, S. (2000). *Relationality: From Attachment to Intersubjectivit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Murray J. (1995) On objects, transference, and two persons psychology: a critique of the new seduction theory. *Psychoanal. Psychol.* 12(1): 31-41.

Nagera, H. (1966). *Early Childhood Disturbances, the Infantile Neurosis, and the Adulthood Disturbanc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Ornstein, A. and Ornstein, P.H. (2005).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linical Work. *Psychoanal Q* 74:219-251.

Papiasvili, E.D. (1995) Conflict in Psychoanalysis and in Life. *Int.Forum Psychoanal.*, 4:215-220.

Rand, N. and Torok, M (1996). Fragen an die Freudsche Psychoanalyse. *Traumdeutung, Realität, Fantasie. Psyche* 50/4, 289–320.

- Rangell, L. (1963). The Scope of Intrapsychic Conflict—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Considerations. *Psychoanal. St. Child*, 18:75-102.
- Rangell, L. (1983). Defense And Resistance In Psychoanalysis And Lif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1S:147-174.
- Rapaport, 1951: The Autonomy of the Ego, *Bull.Menninger Clin*: 15:113-23.
- Rapaport, D. (1957).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cept.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David Rapaport* (1977, pp. 685-709). Masterwork Serie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 Raskovsky de Salvarezza, R. (Ed.) (1974). "Asociación Psicoanalítica Argentina, 1942-1992", *Revista Argentina de Psicoanálisis*, Tomo XXXI, No 1-2, Enero-Junio 1974: Homenaje al 30(o) aniversario de la APA y de la Revista de Psicoanálisis.
- Rascovsky, A. (1981): *Filicidi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Orion.
- Rey, J.H. (1988). That which Patients Bring to 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69:457-470.
- Richards A., Willick M. (1986). *Psychoanalysis: the science of mental conflict: 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Brenn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Richards AD (1986). Introduction. In: *Psychoanalysis, the Science of Mental Conflict: 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Brenner*. (Arnold Richards and Martin Willick, eds.), op.cit.
- Richards, AD (1992) *Unconscious fantas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Jacob Arlow*. *Clin. Psychoanal.* 1:505-512.
- Richards, AK and Richards AD (2000). Benjamin Wolstein and Us: Many Roads Lead to Rome. *Contemp Psychoanal* 36: 255 – 265.
- Richards, AD and Lynch, AA (2010). From Ego Psychology to Contemporary Conflict Theory: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Ellman S (ed.) (2010) *When Theories Touch*. London: Karnac Books.
- Rosen, S. (2014). *The Idea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feld, H. (1964). 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narcissism: a clinical approach. In:
- Rosenfeld, H. (1966). *Psychotic States: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pp. 169-17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Sandler, J. (1960). On the concept of superego. *Psychoanal. Study Child* 15:128-162.
- Segal, H. (1962). The Curative Factors in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43:212-217.

Segal, H. and Britton, R. (1981). Interpretation and Primitive Psychic Processes: A Kleinian View. *Psychoanal Inq* 1:267-277.

Segal, H. (1997). The Oedipus complex today. In *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Slavin, M. & Kriegman, D. (1992). *The Adaptive Design of the Human Psyche*. New York: Guilford.

Smith, H. F. (2000a). Conflict: see under dissociation. *Psychoanal. Dial.*, 10: 539-550.

Smith, H. F. (2000b). Countertransference, conflictual listening and the analytic object relation.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8: 95-128.

Spezzano, C. (1998). Listening and interpreting—how relational analysts kill time between disclosures and enactments: commentary on papers by Bromberg and by Greenberg. *Psychoanal. Dial.*, 8: 237-246.

Steiner, J. (2005). The Conflict between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Psychoanal Q* 74:83-104.

Stern, D. B. (1997). *Unformulated Experience*.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Stern, D.B. (2004). The eye sees itself: Dissociation, enactment,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onflict. *Contemp Psychoanal*, 40, 197-237.

Stern, D.B. (2015). *Relational Freedom: Emergent Properties of the Interpersonal Field*. New York: Routledge. (The article on unconscious phantasy, above, is reprinted here as a chapter.)

Tabakin, J. (2015). The Value of Interpretation: Thoughts on a Controversy. (in press, *Psychoanal. Dial*).

Taylor, D. (2011). Commentary on Vermote's 'On the value of 'late Bion' to analy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t J Psycho-Anal*, 92:1081-1088.

Tyson, P. and Tyson, R. (1990)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elder, R (1930).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Function, in: Guttman, SA, ed: *Psychoanalytic Observation, Theory, Application*. NY: Int. Univ. Press, 1976:68-83.

Winnicott, D. W. (1945). 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1975), (pp. 145-156).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100: 1-325.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Winnicott, D. W. (1960). The theory of the parent-infant relationship. In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1965), (pp. 37-55).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64:1-276.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Winnicott, D. W. (1962). Ego Integration in Child Development. In: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1965), (pp. 56-63).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64:1-276.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Winnicott, D. W. (1965).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 64:1-276.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Young-Bruehl, E. (1988). *Anna Freud: A Biograph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區域顧問與撰稿人

歐洲：Dr. Christine Diercks and Maria Ponsi, MD

北美洲：Aron L. PhD; Bachant, J.L PhD; Gottlieb R., MD; Harris A., PhD; Lichtenstein D, PhD
Lynch, A.A. PhD; Papiasvili, E.D, PhD; Richards, A.D, MD; Richards, A.K, CSW; Stern D., PhD;
Tabakin, J., PhD; Tobias, L., PhD; Traub-Werner, D., MD; Webster, J., PhD

拉丁美洲：Dr. H.C. Cothros, H.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Eva D. Papiasvili, PhD, ABPP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跨區域精神分析百科辭典，接受創作共同授權條款當中〔創作共同—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CC-BY-NC-ND)之授權協定。核心權利保留予作者群（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及其會員撰稿人），但此材料可被他人使用，僅限於非商業用途，清楚註明引自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包括提及此連結 www.ipa.world/IPA/Encyclopedic_Dictionary），並且必須是逐字引用，不可是改寫、編輯或重組的型式。請按此找尋辭彙。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楊筑甯 (Chu-Ning Yang)、黃泰翰 (Tai-Han Huang)、劉又銘 (Yu-Ming Liu)、陳昌偉 (Chang-Wei chen)、呂思珊 (Szu-Shan Lu)、沈志仁 (Chih-Jen Shen)、洪雅琴 (Ya-Qing Hong)、丁耕原 (Keng-Yuan Ding)、張秀玲 (Hsiu-Ling Chang)、莊麗香 (Li-Hsiang Chuang)、賴憶嫻 (Yi-Hsien Lai)

協調 (Coordination)：楊明敏 (Ming-Min Yang)、周仁宇 (Jen-Yu Chou)、林俐伶 (Liling)

Lin)、陳冠宇 (Kuan-Yu Chen)、蔡榮裕 (Jung-Yu Tsai)

編輯 (Editing) : (劉玉文 (Yu-Wen Liu)、王明智 (Ming-Chih Wang)、陳瑞君 (Jui-Chun Chen)、王盈彬 (Ying-Ping Wang)、陳建佑 (Jian-You Chen)、劉又銘 (Yu-Ming Liu)、郭曄 (Yeh Kuo)、吳念儒 (Nien-Ju Wu)、蔡榮裕 (Jung-Yu Tsai)

校譯 (Proof-reading) : 邱顯智 (Hsien-chih Chiou)、唐守志 (Shou-Chih Tang)、李冠儀 (Kuan-I LEE)

審閱 (Final-checking) : 樊雪梅 (Hsueh-Mei Fan)

協調 (Coordination) : 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ía Inès Nieto)